



两个危险区（用线圈出），是1975年4—6月多次向国务院汇报的原稿

但许多颇有影响力的老专家都站在老梅一边，支持我的仅仅是几位年轻同行。态度最明确的主要有研究大旱与大震对应关系的耿庆国、研究日本海深震与华北地震对应关系的吴佳翼与研究大地构造判别潜在地震危险性的贾云年等，从几次会议发言看，倾向于华北有大震者占绝对少数，乐观估计也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

我与北京市地震队耿庆国、地球所吴佳翼比较熟，三天两头能在会议上见面，而与贾云年的相识纯属偶然。一天，我收到一封署名河北省地震局贾云年的信，信上把我名字误写为“汪承明”。他显然在某次会议上听到了两种观点的争论，见证了主震派处于势单力薄的弱势地位，他特意写信来支持、鼓励我们，表示愿与我们一起战斗，加盟主震派。

不久，在一次会议休息时，我见到正在与人谈话的河北省地震局的王

泽皋，我们曾一起在邢台地震时共事过，很熟。于是我鲁莽地插进去问：“你们河北局有个叫贾云年的吗？他给我写了封信，姓名中三个字竟然错了两个字，岂有此理！”

王泽皋指着旁边与他谈话的一个戴眼镜的秀气阳光青年说：“来，认识一下！贾云年，科大高才生，刚从云南省地震局调来的，能歌善舞。”

“很抱歉，久闻大名，我觉得问题很严重，冒昧给您写了信，匆忙中出现笔误，实在对不起！”贾云年态度非常诚恳。

这一回轮到我不好意思了，为了缓和尴尬气氛，我提出会议后请他一起到科委食堂喝啤酒。由于投缘，我们一见如故。在饭桌上他慷慨激昂地详细阐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并用筷子摆出华北主要断层格架与地震形势判断图。

“我完全同意海城地震后华北地区地震危险性加剧的结论，地震局领导若被东部震情将缓和的观点误导，把工作重点向西部转移，肯定要犯重大的战略性错误，早晚会出事的！这就是我冒昧给您写信的原因！”他激动地挥着胳膊，从眼镜片后射出炯炯逼人的光。

“我的研究表明，华北北部近期还将有一次8级地震。会议后我很快就要带队下去跟踪监测，首先要盯着唐山、滦县一带，但愿我们一起能抓住它，再打个海城地震一样的漂亮仗，为国立功、为民造福！”临别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就像是生死离别。

贾云年的愿望没能实现。唐山地震时以他为首的河北地震局赴唐山考察六人小组全部英勇殉职。我们再次见面是在唐山胜利桥地震队的废墟前，塑料尸体袋中裹着血肉模糊的尸体，完全无法辨识，但从折断的眼镜架我认出了他，肯定是他，那秀气阳光的青年！那深入虎穴勇敢伏虎反被虎噬的无畏猎手！他的名字永远铭刻在我国防震减灾的英雄史册中。为了纪念这位忠诚的地震战士，我至今还保留着他写给我的那封有历史价值的请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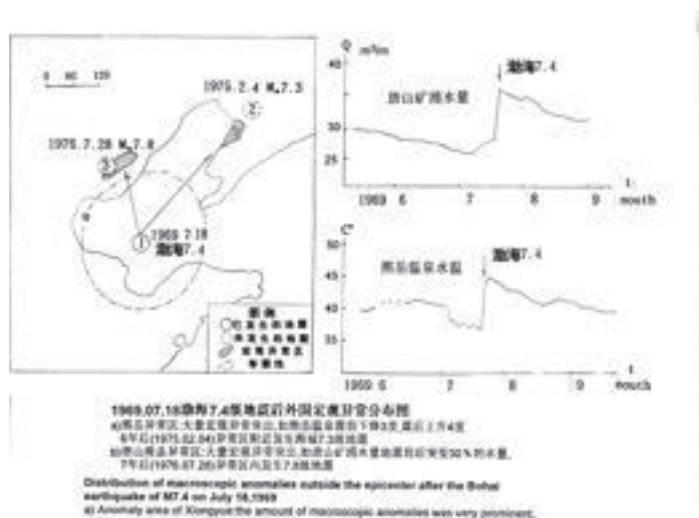
海城地震后专家们对华北地震趋势评估出现严重分歧。贾云年认为华北近期还有发生大地震的可能，地震局领导若采纳“地震形势将缓和”的判断，将犯重大战略性错误。（贾云年同志为了监测唐山地震在地震现场光荣殉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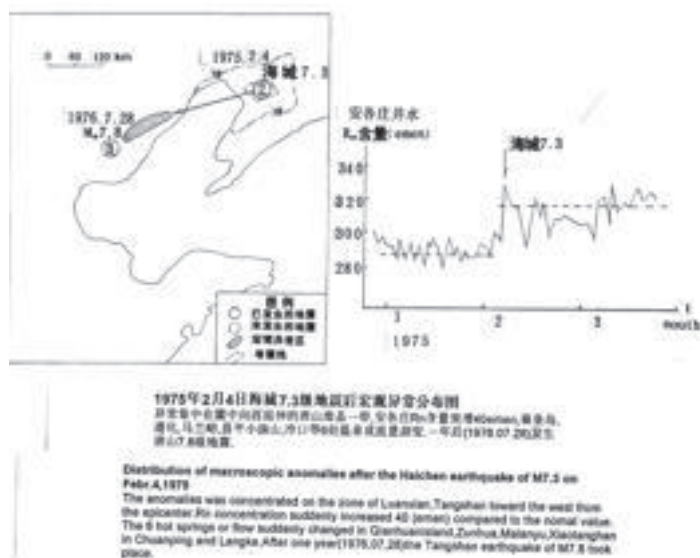
40年后作者在贾云年墓前展示了中组部有关“青龙奇迹”的报告以告慰亡者

其实，我本人竭力坚持唐山、滦县一带震情严峻的主要依据是邢台地震后持续十年“大震后效异常场追踪预测地震”研究的结果（见本书第二部分第二章）。从1966年3月8日6.8级地震后效异常场可以追踪预测3月22日7.2级地震。从3月22日7.2级地震的后效异常场又可以追踪预测1967年3月27日河间6.3级地震。1969年7月18月发生渤海7.4级地震，根据后效异常场分析，人们惊奇地发现离震中较远的辽宁熊岳地区与河北丰南地区反而出现较严重的房倒、地裂、地下水位波动、泉水流量与

温度剧变等异常现象。结果，渤海地震后下一次大震就发生在离熊岳不远的海城。



渤海地震后效异常的地区为辽宁熊岳地区与河北丰南地区，几年后发生海城地震、唐山地震（见熊岳温泉温度变化、唐山矿涌水量变化）



海城地震后烈度异常集中在唐山、滦县一带（见滦县安各庄氡气异常），可能是应力向唐山地区转移的标志

渤海地震的两个后效异常场中的一个地点（辽宁熊岳地区）已经得到了验证，附近发生了海城地震。另一个地点（河北丰南地区）始终是我心中巨大的纠结。海城地震后我第一时间取得后效异常场资料，摊开图一看顿时被滦县安各庄、田疃等地的异常变化吓出了一身冷汗。在海城地震发生的一瞬间，距震中达 400 公里的安各庄井水中氡含量竟然升高三十多埃曼，超过某些震中区水点的变化。说明渤海、海城两次地震后的大范围地应力调整的资料表明，两次地震的应力场调整都把唐山、滦县地区推向深渊，这是大自然两次对人类的报警。何况，海城地震引起从秦皇岛到北京六处温泉出现异常，温度、流量突变并伴随大面积喷砂冒水等宏观异常。因此，我在许多场合，甚至在国务院汇报时都展示这些资料，反复强调海城地震后下一次强震可能在唐山、滦县一带发生的预测意见。与贾云年的观点不谋而合。



海城地震后从秦皇岛到北京六处温泉出现异常，温度、流量突变，喷砂冒泡



青龙县冷口温泉的异常现象。1976年6—7月（唐山地震前1—2个月）该泉水温度上升并出现大量翻花冒泡异常现象。此照片作者摄于1976年7月12日

但是，无论四大支柱前兆异常的数据还是后效异常场追踪预测的生动实例，在视测震学为唯一正统预测方法的专家们眼里都不值一提，他们死抱着三千年历史地震目录与能量积累理论说事，地震局系统中的权威老专家十之八九都是研究地震活动性的。因此，每次交锋都以东部有震派的失败而告终。

2. 抱着烫手山芋的京津组

海城地震后的一年内，我成了中南海的常客，三天两头去中南海向中央领导汇报震情，多数时候是胡克实或刘英勇带着老梅与我去，偶尔换成带丁国瑜、马宗晋去。我记忆最深刻的是1975年夏天的一次汇报会，听取汇报的有邓小平、李先念、吴德、黄作珍等领导，汇报主题是海城地震后京津地区的地震形势。

老梅先从三千年历史地震记录结果汇报起，数据、图表、分析、推理，头头是道，最后的结论是：“请领导放心，认为华北近期再发生大地震的依据不足！”

其实，她的这种观点已经反复汇报过几次了，几位领导对此也耳熟能详。每逢这时候，我都坐在一旁保持沉默，不想把我们内部的争论搬到国家领导人面前来谈，这也是地震局领导反复叮嘱过的。

这一天，不知出于何原因，或许极其聪明的胡克实发现老梅的语气过

分肯定，没有留余地，或者他隐约担忧这一结论有什么破绽，会使地震局陷入被动，他在老梅发言后出乎意料地说：“对这个问题我们内部有争论，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是我们保卫京津组组长汪成民，他代表另一种观点！”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示意我上去发言。

“好哇，地震局的8341首长来说说你的意见！”李先念开着玩笑催促我上台。

我虽然感到突然，但对发言内容已烂熟于心。我谈了前兆台站四大支柱异常、一批地下水等宏观异常以及渤海、海城两次地震的大范围应力场调整都瞄向唐山、滦县一带的观测资料，我强调这是大自然两次对人类的报警，提醒我们此地区存在发生大震的潜在危险。

这时吴德摘了眼镜凑到跟前看我带去的一张京津地区地震形势分析图，图上唐山、滦县一带用红笔标出。（我至今还保留着这张原图）

“不得了，地震就要震到我家门口了！”吴德标准京腔的尾音后拖着浓厚的唐山味。

最后，邓小平指示：“京津地区工作是涉及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大事，一定要抓紧办好。拜托了！拜托了！”

临走时几位首长都对我们反复说“拜托了”。“拜托了！”三个字形成压在我肩膀上的巨大压力，如同三座大山。

不久，上面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次受批判，胡克实也被解除工作靠边站，对这次重要会议再也没有人提起，更谈不到如何贯彻执行国务院领导的指示了。

地震局又恢复到老样子，继续唱东部平安、西部危险的调子。

胡克实逝世前，我到深圳探望他时曾专门问过他：“你当时为什么把我推上去发言，是否对唐山大地震有所预感？”

“关于我对唐山地震预报失败的教训认识，我曾给全国人大写过信与报告，此信也转给你们了。我明确提出唐山地震未能预测的原因，一是没能聚精会神地正常工作，一是对某些前兆与意见没予以充分重视。假如当时



2003 年 1 月在深圳探望重病中的国家地震局原党委书记胡克实同志

建築院

[illegible]

148

1976年4月6日，北京以西约350公里的和林格尔发生6.2级地震。起初，我以为这次地震的发生证明我们对华北地震形势严峻的判断是正确的，是对华北主震派的有力支持。想不到几次会议下来，老梅等一批专家的发言得出的却是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和林格尔地震的发生，证明京津地区的震情更趋于缓解。因为，京津地区“四大支柱异常”可能已交代给和林格尔地震，从此可以一笔勾销了。更有甚者，有人从理论上计算，海城地震加和林格尔地震已经把整个华北地区多年积累的能量消耗殆尽，今后一段时期内华北地区地震活动将进入平静期、免疫期（休眠期）的依据更充分了。语言如此“精彩”，论据如此“科学”，导致持华北还有大震观点的专家们进一步分化瓦解，纷纷倒戈，本来人数不多的团队，只剩下少数骨干坚守阵地。

1976年5月29日云南龙陵发生7.4级地震，更使地震局领导认为专家们提出把重点向西转移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拆东墙补西墙把原来部署强化京津地区地震监测的流动重力测量队、流动地形变测量队等纷纷向川滇调动，河北省、天津市的几位技术骨干也先后抽调到西南支援。谁知一个多月后，真正的惨剧却在多数专家疏忽的首都圈内发生了。

我作为保卫京津组组长，眼看地震局不断将守卫京津地区的防卫力量抽调出去支援川滇而心急如焚，一方面收到报上来的异常信息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监测首都圈的技术力量日益削弱，局党组书记胡克实靠边站了，局长刘英勇从来不拍板拿主意，分析预报室主任老丁已亲自带队去龙陵了，副主任老梅是坚定的西南派，她天天吵着也要去四川捕捉大地震。

我们每收到一封通报地震信息有异常的信件、一个报警的电话，就如抱着一个烫手山芋，不知如何处理。但我清醒地意识到万一出事，我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替罪羊的厄运，这种例子在“文革”期间难道还少吗？

3. 苦思冥想谋对策

坐在火山口上天天烟熏火燎地挨日子的我情绪当然极坏。

一天，父亲的好友邵二南工程师（北京市原副市长陆宇澄的岳父）来访，

他和我父亲曾在云南一起修铁路、住牛棚、被造反派揪斗，当父亲被造反派弄断食指时，就是这位邵工程师冒着被造反派批斗的危险把父亲的断指找回来的。

“二公子！最近北京地震形势如何？”

他常常这样称呼我，询问震情是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我一反以往热情回答、详细解释的态度：“邵伯伯，没什么可说的。”

“震情缓和了？”他问。

“不，恰恰相反，震情可能更严重了。”

“过来，给我们说说。”

我长吁短叹地不愿意开口。在一旁的父亲把我的处境详细向邵工进行介绍：“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震情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领导越来越不想担责任，大小风险由几个年轻人扛着。年轻人面临有震不报受处分坐牢，无震虚报也坐牢受处分，反正躲不开这一劫了。”父亲与邵工都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1949年以来经过无数次运动的磨砺，都有在各种危险的环境里进行自我保护的丰富经验，他们很理解我的处境，想给我支支招。首先，邵伯伯严肃地问了我几个问题：

“你必须坦诚地告诉我，第一，地震形势紧张是杞人忧天，还是确实有较充分的科学依据？”

“确实有较多的依据，我能保证信息是真实可靠的，至于对应地震的效果大家都没经验，我说不清楚。”我回答。

“第二，你认为发生较大地震的可能性如何，有几分把握？”

“可能性较大！但地震预测没过关。地震有多大、什么时候发生，谁都没有十分把握。唯一对发生地点在唐山一带的依据较多。”

听了我的回答后，邵伯伯与父亲足足讨论了半个多小时，然后提出几条锦囊妙计作为我应对困难局面的行动指南。我把他们的意见与一些我特别信任的好友反复讨论，最后形成十六字箴言：积极亮相、回避争吵、注重实干、切忌冲动。

根据十六字箴言，我给自己制定了以下四项行动原则：

(1) 对震情的严峻性的认识要尽量多表态，多亮相。但不要说肯定或否定的硬话，以免惹麻烦，因为地震预测谁也没把握。

(2) 正视自己势单力薄的现实，避免与对立面正面交锋。充分利用 69 号文的政治威慑力作为有震观点的保护伞。

(3) 千方百计组织好保卫京津小组的技术力量，埋头苦干，提高团队识别地震信息、预测地震的能力，这是我的底牌。

(4) 对震情严峻的认识不能仅在地震系统内宣传，要扩大影响，争取在各部委尤其在领导层中造舆论，得到他们的支持与认可。

4. 我的六项措施

根据十六字箴言与四项行动原则，我采取了以下六条措施。

措施一：尽量将自己的观点挑明，并争取把观点记录在案。

1975 年底，在丁国瑜组织召开的“一九七六年全国地震趋势讨论会的准备会”上，就如何评估地震趋势基调问题我与老梅展开争论，尤其对华北地震形势的估计分歧更大。丁国瑜作出一个聪明的决定，一反以往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当时还叫分析组）在全国地震趋势讨论会上只派一人作主题发言的惯例，决定 1976 年初召开的全国地震趋势讨论会我们分析组派两人作主题发言，由老梅谈西部地震趋势，由我谈东部地震趋势，各抒己见，互不干扰。

这样，我就争取到了在地震局最权威的会议上向领导与代表们亮明自己观点的机会。那一年的会议纪要与对国务院的报告由胡克实亲自把关，我记得他曾把我和老梅叫到他东皇城根家里，逐字逐句一直修改到半夜。在我坚持下，虽然把对“华北震情严峻性要予以充分重视”的内容最终写入了文本，但由于老梅的反对，又不得不在危险地区与危险程度上作出让步；危险地区由唐山—滦县一带，扩大为冀辽交界一带，危险程度由六级左右降为五至六级。这是取得成功的第一步，对首都圈震情的严峻性明确表了态，并在最权威的文件上记录在案（见 1976 年我在全国会商会报告及地震局给中央的 1976 年地震形势报告）。

关于一九七六年地震趋势的意见

国家地震局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北京召开了海城地震科技经验交流和一九七六年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地震部门、局属各单位和有关协作单位的负责同志和科技人员二百五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以路线斗争为纲，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了周总理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地震工作的指示，畅谈了地震战线的大好形势，进一步认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提高了执行我国地震工作方针的自觉性。代表们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在深入总结交流海城地震科技经验的基础上，以大量的前兆资料、数据为依据，对一九七六年的地震活动趋势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得出如下意见：

一、当前我国处于地震活动的活跃阶段。

一九七五年，我国共发生了7级以上地震二次，5—6.9级的地震二十次，强余震

— 1 —

是——乌兰一带。

3.京、津、唐、张、渤地区应加强监测。

地震活动及大地测量等资料表明，京、津、唐、张、渤一带及其邻近地区，经海城地震之后，仍然存在着发生5—6级地震的潜在危险。其主要依据是：小震活动仍很集中或带阵发性空区的分布；许多台站的地应力、应变、唐山、蓟县、中河庄等台的地电、香河一带的地形变、涿州、新阳、沈阳等台的地倾斜，以及一些台站的水文观测，多发现年平左右的异常；在辽宁西部的老虎山——大庙、河北的涿县——涿鹿等地的重力复测发现几段较明显的异常变化。总的看来，河北的东部和辽宁的西南部，观测到较多的中期趋势异常。因此，在冀东以至冀辽交界地区（包括渤海沿岸）及京津之间，要继续加强观测分析工作。

4.河北、京北、鲁南、豫东一带要进一步加强观测研究。

自一九七一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华北、华南等地震明显增多，接连发生五次4—4.9级地震和江苏海州5.3级、黄海5.3级地震，表明本区已进入强震活动期。在这一地区再发生强烈地震是有可能的，甚至发生6级以上地震的可能。在天津——阜新一带，

会中的小震活动分布形成空区；在安徽宿县及河南濮县两地区的重力复测和临震山——市这一带的水准复测都发现有异常的存在；有的台站也观测到短水准、地应力有较突出的异常现象，水文和地质以及沿海海面升降等也都观测到一些异常；此外，在这一带的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地面、暴雨地下水变化等较多的前兆异常现象，在这一地区内尤应注意项城——阜阳——凤台一带，扬州以东以及鲁南等几个地区。

五、有些地区已发现一些异常现象，但还须进一步观察、观测。

如新疆的乌鲁木齐——伊宁、库尔勒——乌什一带，内蒙古包头——固阳一带，山西的忻定盆地，晋、陕的汾渭河谷、宁夏的固原、海原、固原及其邻近地区，吉林的四平——伊通、通辽，黑龙江的布特哈旗、穆稜以及东南

部海拉尔等地。海拉尔一带，地震活动频繁，已先后发生多次5级以上地震。在这一地区再发生强烈地震是有可能的，甚至发生6级以上地震。在这一地区还出现了特大地震，也是值得注

冀东北、冀辽交界地区及京津之间应加强监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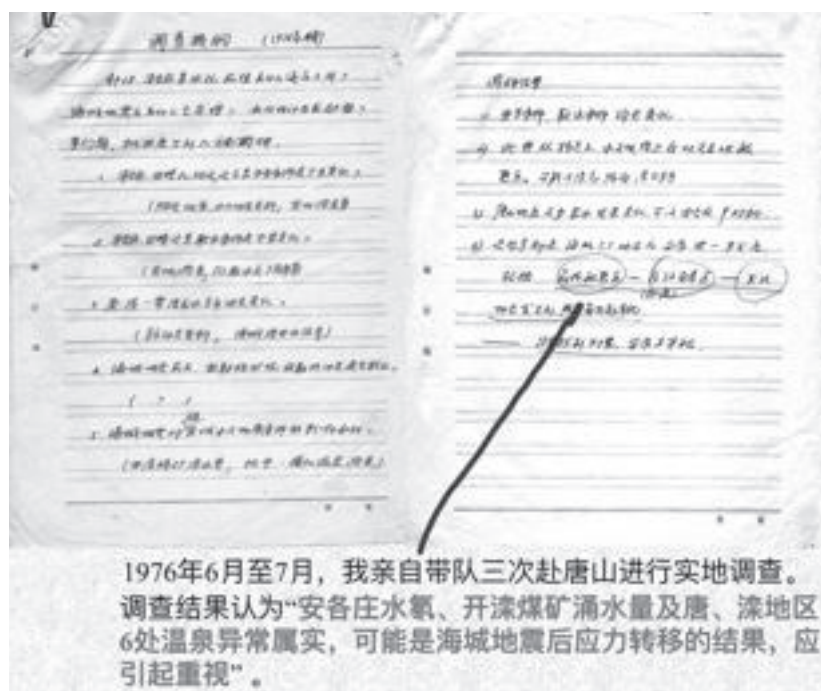
1975年底我们内部对1976年华北地震形势的认识分歧很大，领导决定分别由两人代表分析组在全国会商会上报告，由我作中国东部震情报告，报告中再次明确指出“唐山—滦县及冀辽交界”为危险区。图为我们给中央的报告

措施二：组织京津组全体骨干，反复赴唐山现场调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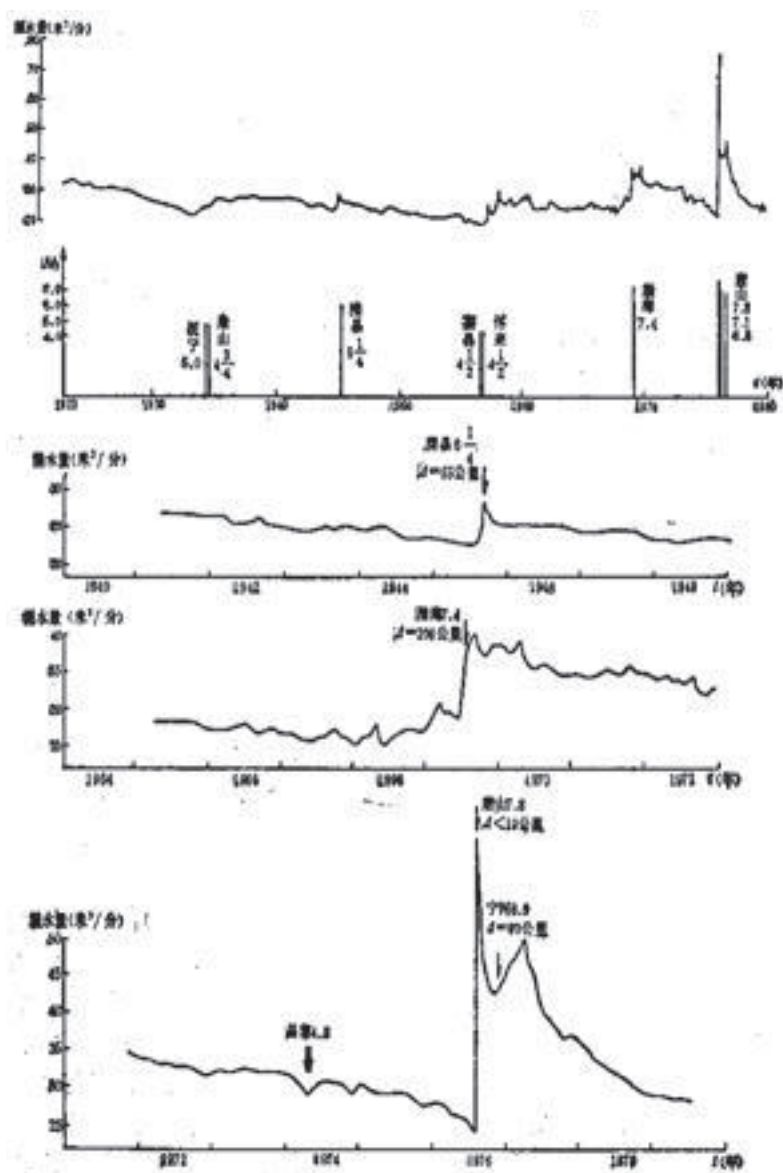
自1976年3月至7月京津组动员全体18位骨干先后三次赴唐山至滦

县一带收集资料、落实异常，从专业地震台站到群众测报点挖地三尺寻找、排查可能与地震有关的前兆现象。

这是中国地震局有史以来第一次锁定未来震中区大规模、兴师动众地开展现场调查研究。调查组由我们负责并邀请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的地震队加盟，对四大支柱异常进行深入解剖，尤其通过对滦县安各庄、田疃的水氡异常的研究，唐山矿近百年涌水量的分析，明确指出海城地震后应力向唐山一带聚集的重要结论，这不仅为唐山地震总结留下许多宝贵第一手资料，也为唐山地震后洗刷强加在我们身上，因不作为而漏报地震的罪名提出充分有力的证据（见 1976 年 5 月京津组对重大异常的调研报告）。



保卫京津小组锁定唐山为主要危险区，三次调查结果都证明此判断正确



措施三：对中央各部委广泛进行震情严峻的宣传攻势、大造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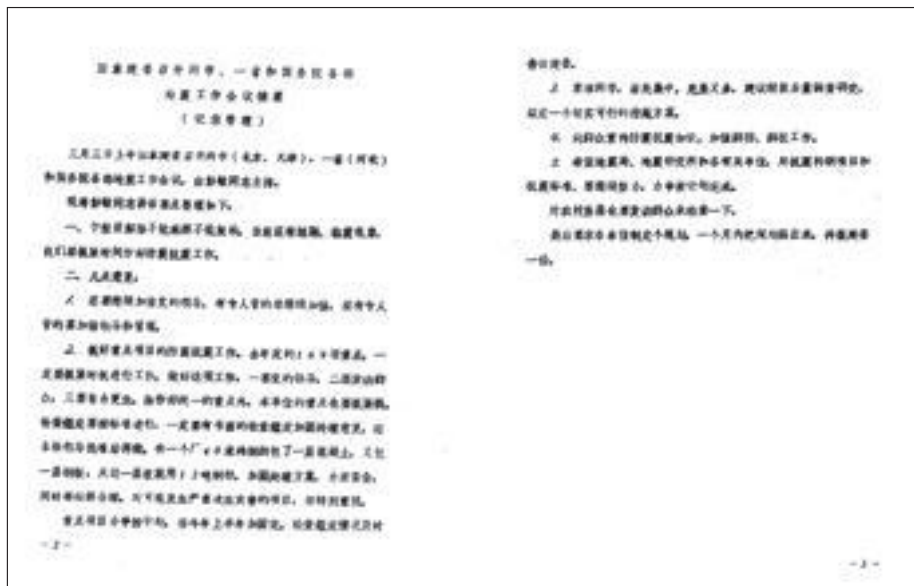
虽然在地震趋势东西之争中东部主震派节节败退，但有一个底线他们谁也不敢触及，这个底线对所有领导、专家都有强大的震慑力，那就是 69 号文。

国务院〔1974〕69号文明确提出“在今明两年内，在华北及渤海地区可能发生强震，各有关单位要立足于有震，做到有备无患”，按文件要求警戒时段至少应该持续到1976年底。尽管海城地震后地震局大部分专家与领导都倾向于认为东部再次发生大震的可能性不大，可是当我要求局领导明确表态是否打报告撤销69号文时大家都犹豫了。我记得支持老梅“见好就收，一网很难打两条大鱼”的观点的仅副局长卫一清一人，当过兵的刘英勇局长、张魁三副局长都认为对中央文件要百分之百地贯彻执行，不能打折扣。最后，由刘英勇拍板决定：一直到1976年底之前，必须坚持贯彻、执行69号文的各项要求，不能有丝毫懈怠。

有了这口尚方宝剑后我马上给刘英勇报告：“鉴于首都圈附近震情严峻，不少单位在海城地震后对防震减灾工作有所放松，建议加强对贯彻执行69号文的宣传，对京津地区各部门的防灾措施进行检查。”他对此表示同意，我立即以保卫京津组名义与各部委地震办公室联系，要求联合起来对地震形势宣传与防震措施进行检查。

从1976年3月至7月我先后在国家科委、经委、计委、建委、地质部、水利部、铁道部、总参、总后、北京军区等十几个部委作了当前京津地区地震形势报告，大造舆论。每次报告都反复告诫大家：“虽然69号文已经对应了海城地震，但并不意味着文件中所要求的防震减灾任务可以有丝毫放松，相反，当前形势严峻，应予以高度关注，我们注意的重点是唐山—滦县一带。”我当时的发言内容可以从许多部委的文件中查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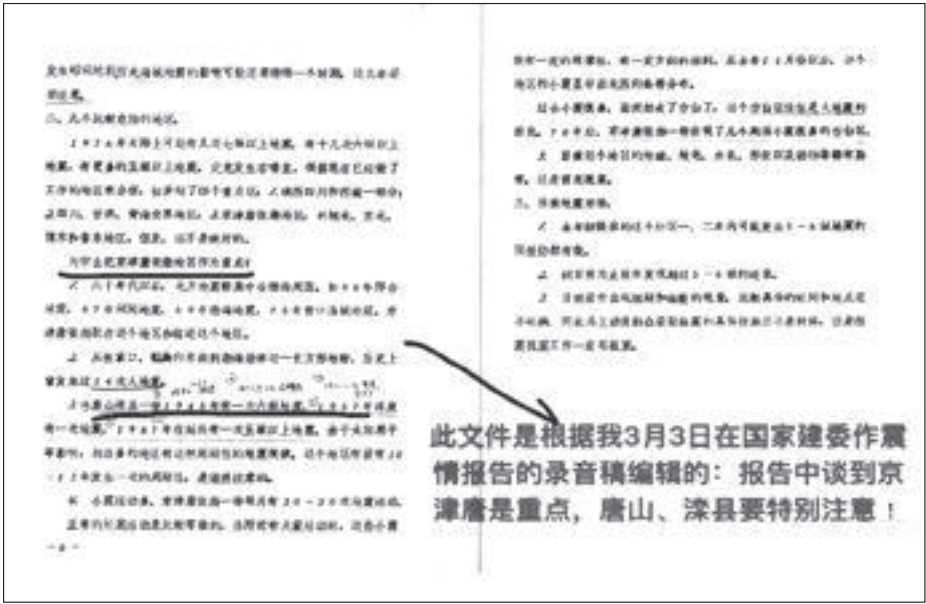
譬如，1976年3月3日国家建委召开了两市（北京、天津）一省（河北）地震工作会议，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简单致了几句开场白后匆匆离去，把会议交彭敏副主任主持，由我作了主题发言。国家建委地震办为了便于传达会议精神，印发了会议文件并附有我的发言录音整理稿，其中我明确提出1976年本地区震情严峻，尤其要注意唐山—滦县一带危险。这就是在唐山地震后，地震局内外对京津保卫组及我本人一片骂声，而青龙县与几个中央部委地震办能站出来为我们洗刷罪名甚至为我们请功的原因。



1976年3月3日在国家建委召开的两省一市地震工作会议,由余秋里主持,邀请我在会上作震情报告,此为传达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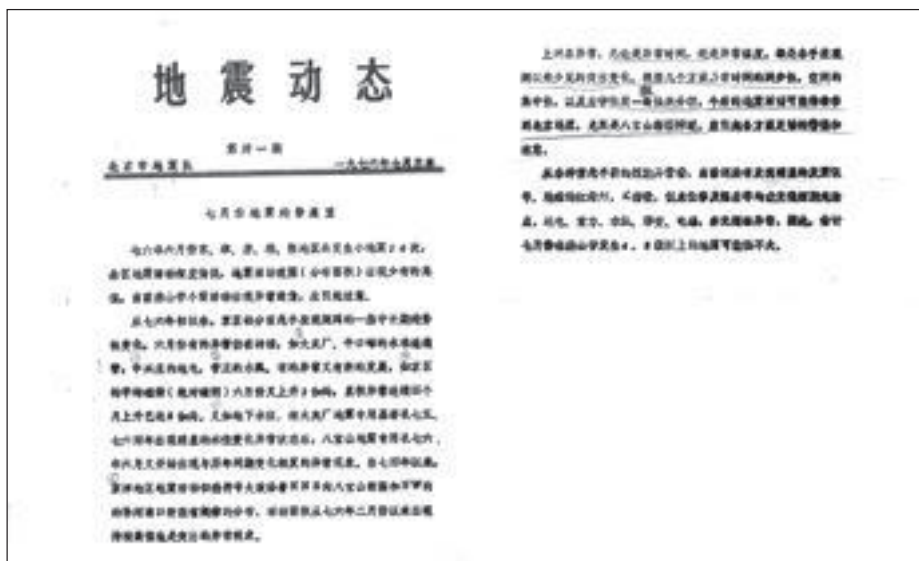
这是根据我报告的录音记录所形成的传达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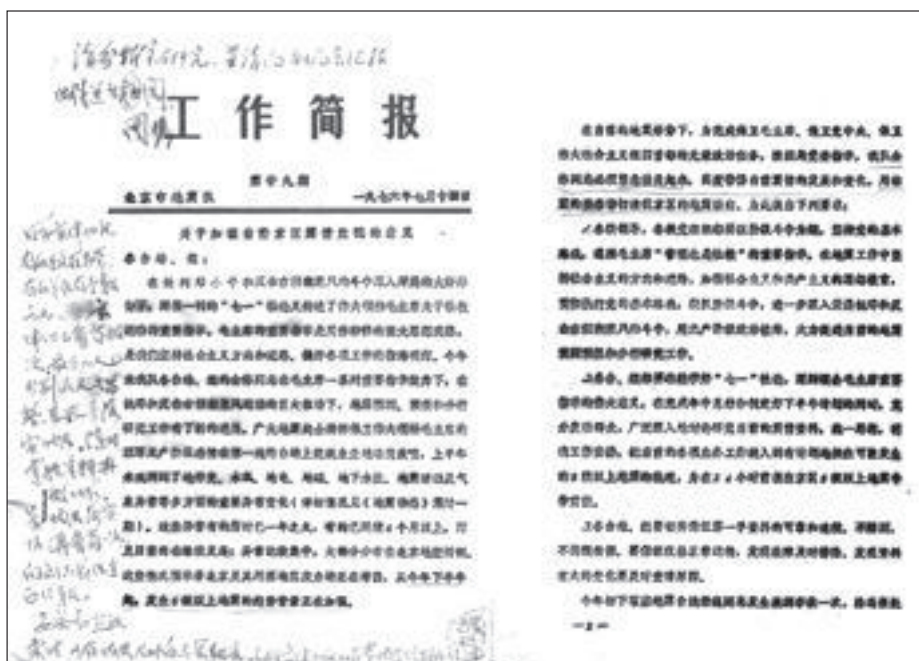
会议纪要指出（根据汪成民报告的录音整理）：“目前处于地震活动高潮，下一次大地震可能转移到京津唐一带，尤其唐山、滦县要注意。”

措施四：发动群众，捕捉地震临震信息。

对地震局内部、中央各部委乃至国务院领导广泛宣传、大造舆论之后，我意识到要取得地震预测实效，关键是必须抓到可靠的临震信息。海城地震经验表明，震中地区的台站、群测点是提供短临信息的重要来源，只有收集到较多的地震短临异常信息才能说服领导同意向政府建议采取防震措施。1976年7月3日、14日先后收到北京市地震队的两份紧急报告，报告提出“观测到建队以来最突出的异常，形势非常严峻”，“我们必须进入临震姿态来应对当前局势”。北京市地震队的震情动态简报除递呈国家地震局外也上报北京市有关领导，北京市领导指示：尽快向国家局汇报并建议召开一次联合地震形势紧急会商会，统一对当前地震形势的看法。



北京市地震队 1976 年 7 月 3 日(唐山地震前 25 天)发布第 31 期《地震动态》，明确指出：“无论异常时间还是异常幅度，都是观测以来最突出的。”



1976 年 7 月 14 日(唐山地震前 14 天)北京市地震队发布第 29 期《工作简报》，明确提出：“要紧急动员起来，以临震姿态密切注意地震动向。”

尽管如此，我们的应急措施仍然没能赶上大自然的节拍，发出的五百份调查表在唐山地震前仅收回六份，大多数调查表都在测报员手里来不及填写，不过据地震测报员反映，有史以来第一次收到来自国家地震局的“地震短临信息调查表”，这一出乎寻常的做法本身明确传递了地震警报信息，起到了“打招呼”的效果，对地震发生时避免、减少损失起了预警作用。

措施五：主动请缨出席大会，通报当前震情。

在我们一面积极研究震情，准备与北京市地震队会商，一面迅速散发调查表收集短临信息争取说服领导之际，传来地震局群测群防处打算于7月中旬召开华北地区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的消息，会议地点恰好选择在唐山。虽然这个会没有邀请我们保卫京津组参加，但我想如果能利用这个会向群众测报员通报一下当前震情，顺便把地震短临信息调查表当面交给他们，岂不是一举两得。当时分析室主任、副主任都到川滇抓地震去了，我找到支部书记周锐提出去唐山出席会议通报震情的想法。周锐虽然调来不久，但他似乎也知道我与老梅对当前震情认识上有分歧，考虑良久后严肃地对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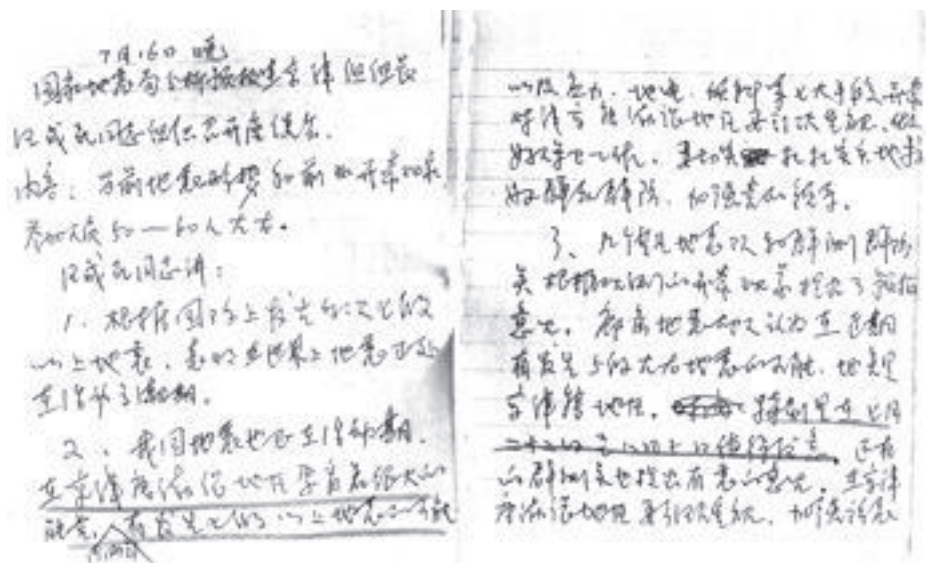
“我可以批准你去，但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在会上说话要十分谨慎，若谈震情必须全面、客观，不能只谈你的个人观点，你的身份很敏感，否则把京津地区搞乱了，是有严重的政治后果的。”

7月15日傍晚我找到经验交流会会址——唐山地区招待所，住下后立即向会务组提出安排“当前华北地震形势报告”的要求，他们请示后答复我：“会议日程已安排满，不好再增加新内容。”

我找到会议组织者查志远、王树华提出发言要求，他们表示大会发言不好安排，勉强同意会议休息时间安排座谈会，由会务组出通知，代表们自愿参加。

7月16日晚上7点半，座谈会开始，由于天气又闷又热，会议三百多位代表大都在屋内洗澡或在外面乘凉，只有三十余人闷在会议室听我的报告。

根据参加震情座谈会的王春青、曹显清等五位代表的会议记录摘要，我在会上讲了如下几点：当前华北地区地震形势比较严重，不要迷信三千



由于到会人数太少，在我强烈要求之下，7月18日晚上又安排了一次座谈会。两次座谈会共有50—60人参加。想不到这两次座谈会，拉开了震惊世界的“青龙奇迹”的序幕，为人类防灾减灾史添加了精彩的一笔。

台站的四大异常继续发展，北京市地震队、河北省地震队、三河地震地质大队等单位的预报意见连续传来，尤其是7月3日与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的两份有关当前地震形势的紧急报告，提出记录到建队以来最突出的异常，要求采取临震姿态来应对。另外，越来越多的群测群防点的宏观异常也反映到京津组来。

161

躲避不及沾上手，都推托给胡克实、刘英勇来处理。我找到胡克实，他一脸无奈地告诉我，他已被免职，正在闭门思过写检查。刘英勇那些天几乎不上班，天天上医院。后来，我才知道 1976 年夏天正是毛主席病重、邓小平受批判、“四人帮”抢班夺权的时候，下面喽啰们蠢蠢欲动，谁会真正关心地震形势？

对于这些重要的地震信息，领导无人理睬、互相推诿，甚至像躲瘟疫似的生怕沾惹上，口头汇报不听、文字报告不批。7 月 3 日、7 月 14 日北京市地震队的两份震情紧急报告，十天后我找局长秘书查询，才了解到除了分析预报室新来的支部书记周锐批了几个字外，局领导都没有表态，我被逼无奈下决心使用最后的对策——贴“呼吁领导重视当前京津地区震情”的大字报，至少让公众知道我已经把烫手山芋抛给了领导，以免一旦出事，被倒打一耙，承担全部责任。

5.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虽然北京市地震队的两份震情紧急报告没有引起国家地震局领导的关注，却引起了北京市领导的重视。北京市主管科技工作的白介夫主任在 7 月 13 日听取了北京市地震队的紧急汇报后明确指示，要求密切关注震情发展，以临震姿态做好震情工作，并责令北京市地震队尽速向国家地震局紧急汇报，共同会商研究震情。

张国民在 7 月 14 日上午给我打了电话，全面传达了白介夫主任的指示，我告诉张国民不仅北京地区告急，唐山、天津一带异常也很多，我将马上带队出发去唐山地区落实异常，联合召开震情会商会只能等从唐山回来后再定。7 月 21 日张国民再次打电话找我，值班员告诉他，汪还在唐山落实异常未归，但老梅恰好从四川回来了，张国民立即找到了她，传达了白介夫主任关于尽快召开会议的要求，老梅以不了解情况为由不同意立即召开会商会。

她说：“我刚从四川回来，不了解情况，汪成民正在唐山调查震情，一切等他回来后再定。”

经张国民与老梅再三商量，双方同意在我从唐山回京后的7月26日召开联合会商会，老梅通过唐山市地震局转告我希望立即回京，商量一下如何参加有史以来第一次联合会商会事宜。

7月26日早8点，京津组全体准时在科委大楼前集合前往北京地震队，唯独老梅没到，我把一车人拉到她家门口停下，专门下车去请：

“老梅，你不是答应去开会吗？大伙都在车上等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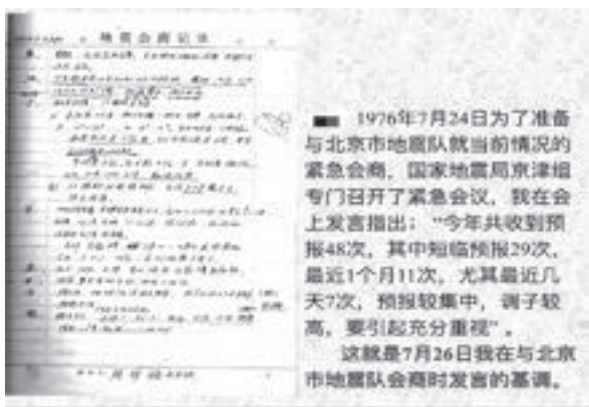
“我实在太忙走不开，况且我也不了解情况！”

“这次会议为了等你已经拖了好些天了，那天你亲口答应国民和我要出席的！”

“我今天病了，一晚没睡，实在没法去！”

左说右说我明白再劝无用，她是铁了心不愿意去参加了。“好吧，你有哪些意见要我代你在会上转达的？”

她清了清嗓子：“我作为分析预报室主任严肃地告诫你，也希望你原原本本地转达给与会同志。四川局的预报已经造成西南大乱，三线上千工厂停工，几十万职工跑回上海躲地震，省里对我们意见很大，如何收拾这局面？假如京津地区再闹起来，问题将比四川严重百倍，是要负政治责任的，你考虑过了吗？没十分把握，千万别捅这个娄子！”



7月24日（唐山地震前4天）京津保卫小组开会准备与北京地震队联合会商，这是当时会议的记录。我指出近来震情严峻，收到预测意见很多

联合会商会从上午8点半开到下午6点，北京队汇报了北京地区地震活动、地形变、水氡、地电、地磁，以及早震关系的异常，我们全面汇报了京津唐渤大范围台站及群测点的宏观异常，尤其是去唐山地区落实异常的情况。我在发言中还重点提到滦县安各庄、田疃两个水氡台站对海城地震的后效异常说明了应力向唐滦地区集中的可能。由于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一批技术人员，没有领导参加，会议只停留在交流信息、分析资料的层面上。最后会议结论是：双方一致认为目前我区存在广泛、突出的异常现象，要引起充分重视，要以临震姿态来对待……具体的预测意见的结论与对策，在此会议上无人敢拍板决定。尤其当我转达了老梅的意见以后，在老梅“别捅娄子”的警告下，这次会议的结局可想而知，只能以“加强观察研究，再向领导请示汇报”收摊了结。

从北京队回来，一路上我脑子里反复闪现“有震不报受处分坐牢，无震空报也坐牢受处分，万一出事我如何才能躲过这一劫”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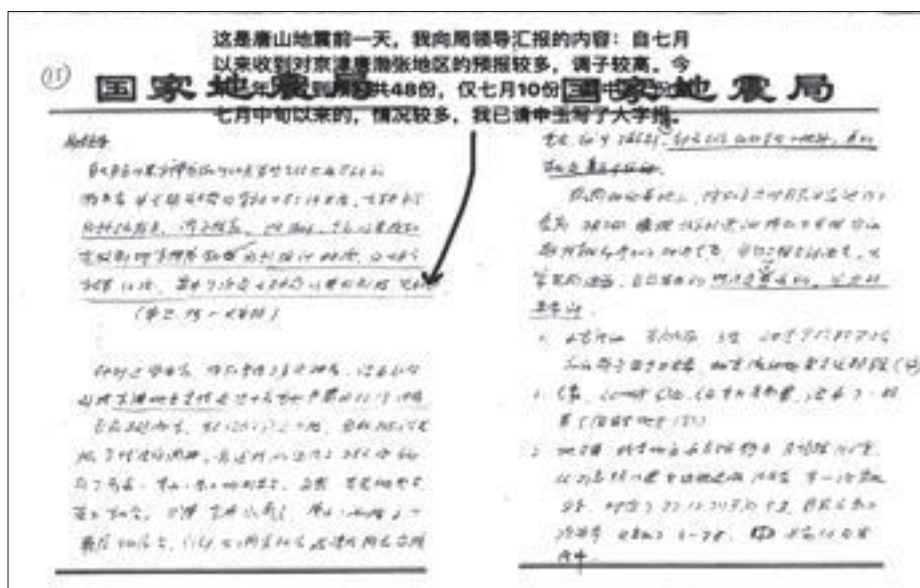
无奈之中我想出一个大胆的方案——在科委大楼里引人注目的地方贴一张特别大的大字报。这能起到轰动效应，既亮明了观点又分清了职责，说不定会引起地震局领导的重视，至少把烫手山芋抛出去，别人不接也得接。

其实贴大字报的办法我几天前已经付诸实践了，7月22日我从唐山回京后几次联系领导汇报无果，我就在领导经常去的会议室门口贴了一张“呼吁领导重视当前京津地区震情”的大字报，但或因篇幅不够大（仅用钢笔书写在两张A4纸大小的纸上），或因那两天领导一直没在会议室开过会，没有引起领导重视，更别说取得轰动效应。从北京队回来后我找到几张特别大的纸张，请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申裕把贴在会议室门口的大字报用特大号的毛笔字誊抄一遍。当天晚上我就把大字报贴在刘英勇局长门口，由于纸张太大几乎把大门都糊满了。第二天上班后，地震局同志与同楼办公的科委同志纷纷来观看。（十年后我发现此原稿被地震局档案馆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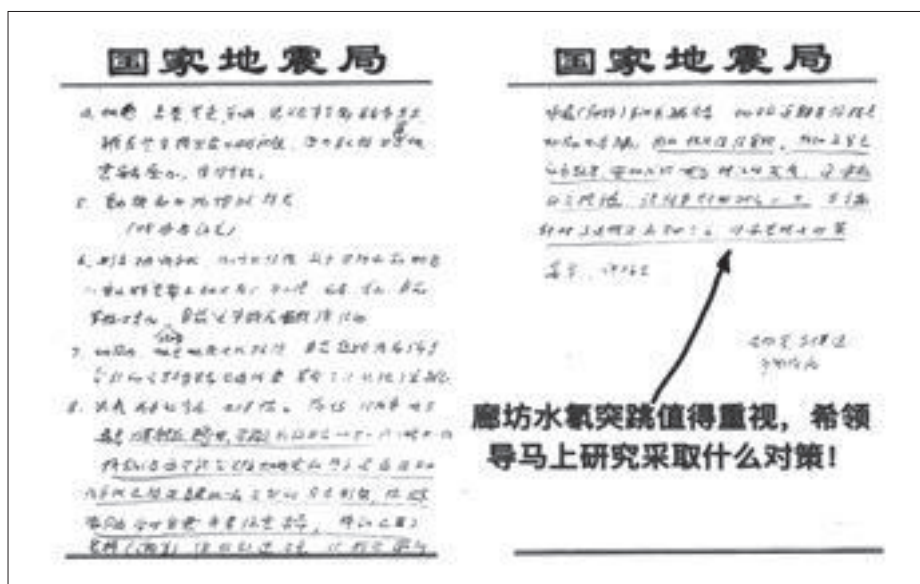
2. 4. 4. 4.

这张大字报果然引起了刘英勇与一些领导的重视，他们终于同意在7月27日当天召开会议研究京津地区的震情。但刘英勇还是没出面，他委托副局长张魁三与造反派头头查志远来听取汇报。

165



1976 年 7 月 27 日（唐山地震前一天）局党组终于听取汇报，我提出：“情况严峻，要紧急动员起来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这是汇报原始底稿



我汇报了全年收到预测意见 48 次，其中短临预测 29 次，仅 7 月以来 10 次、7 月 16 日以来 7 次，北京队已经进入短临状态，安各庄水氡异常要注意，我们已经广泛散发了“短临突变异常调查表”。我在唐山会议上通报了震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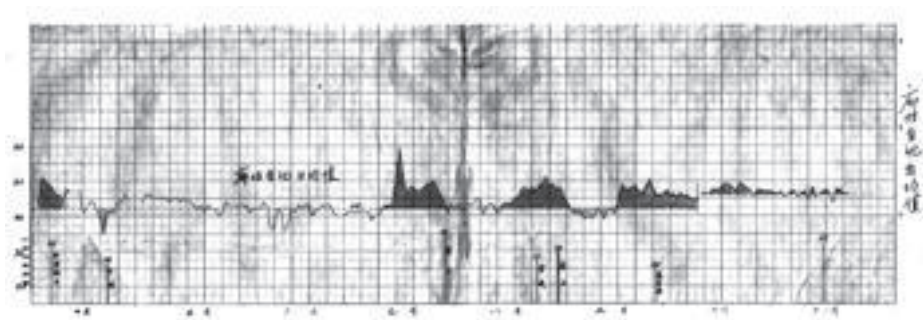
领导征求老梅的意见，老梅胸有成竹地把她7月26日叮嘱我传达给联合会商会同志们的话再重复一遍，两位领导对“搞乱了北京会有严重政治后果，千万别捅这个娄子”的话似乎很在意，频频点头，还说了些“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以生产压革命”等诸如此类的口号，在沉重政治压力的威慑下，与会者谁都不愿带头说句肯定或否定的硬话，会议陷入僵局。造反派头头查志远问：“还有什么新资料、新情况需要汇报？”

我拿出开会前刚刚收到的鄂秀满交给我的廊坊水氡自动记录的突跳异常图，郑重说明根据对水氡自动记录的突跳异常的分析，“若有地震发生应该已经迫在眉睫，不会超过3—5天了，北京市地震局已经提出要进入临震状态，希望国家局领导赶紧决策”。

在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千钧一发时刻，我多么希望领导能像当年周恩来、刘西尧、李四光、胡克实、董铁城那样站出来表态：“你们尽管提出分析意见，由我们来决策、拍板，出问题由我们来承担！”

但今天的领导谁都没吭声，大家面面相觑沉默了好几分钟。

无奈，张魁三最后总结：“通知后勤，明天出一辆小车随时待命，灌满油准备好粮票，小汪再辛苦一趟，先到廊坊落实水氡异常再到唐山对最突出的异常再一次进行调查落实。”



此为我在7·27会议上所展示的廊坊水氡自动记录图，并说：“根据这个记录，若有地震不会超过三五天了！”

盼望许久、寄予厚望的汇报就这样草草收场。

后来有些同志对我提出批评：“在这种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你为什么不能再勇敢一些，更强硬一些，坚决要求领导采取措施，说不定就会改变死亡 24 万余人的历史，延续海城地震的辉煌！”我记得当时直通中央的红机子就在张魁三的手旁，假如他拿起了电话筒一切都将彻底改观，但他没有……

我自己也为错过挽救唐山人民生命的机会而愧疚、后悔了一辈子。我承认除了业务水平不够，对自己的预测结论信心不足外，确实在“搞乱了北京会有严重政治后果，千万别捅这个娄子”的警告面前胆怯了、退缩了，没有像冉广岐那样奋不顾身、舍得一身刚的崇高觉悟与无畏精神。十几个小时后发生了唐山大震。这辆随时待命起程的吉普车恰好派上用场，带着张魁三最先冲入已经夷为平地的唐山市。（在此，我再次强调在目前地震预测不过关的情况下，地震预报是否成功往往取决于领导的一念之差！）

二、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日日夜夜

1. 中南海的汇报会

7 月 28 日凌晨 3 点 42 分，我被强烈的震动惊醒，不顾家人惊慌失措的呼唤，我静躺在床上看着头上电灯剧烈晃动，我心中一块石头落地，甚至有一丝欣慰，等了许久的地震终于来了！

过了几分钟见头上电灯晃动没有停息，幅度却越来越大，我开始害怕了，知道这次地震强度不小，赶紧骑车向地震局跑，沿路见三里河不少居民穿着裤衩背心慌慌张张跑向空地躲避。计委大楼的屋顶已有好几处明显的破损、开裂。还没进地震局大门已经听见里面几十部电话没命的呼叫声。

“哪里发生地震？有多大？是否有伤亡？”电话里问着同样的问题。

高旭等几个值班员一人同时对付几部电话，忙得满头大汗。不久北京军区传来消息，北京向东方向的联络全部中断，估计震中在北京以东某地。

但到底是天津？唐山？锦州？为了不受干扰，测震组把自己关在房里紧张地交切震中，计算确切发震地点与强度，不断从里面传来消息，又不断修改消息。焦急万分的刘英勇局长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门外等待，国务院已经催促几次要听汇报，按目前情况能去汇报什么？带谁去汇报？

“老梅，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去国务院汇报！”

“刘局长，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能去。让小汪跟你去吧！”

在我准备汇报材料的时候，刘局长站在我跟前嘟嘟囔囔又像自责又像诉苦：“这一阵我身体实在不好，血压不稳，头晕得厉害，过问震情确实少了些。”

“这次去汇报，肯定凶多吉少，说话一定要慎重，不该说的一定不要说……”车进中南海，刘激动不已，说话越发情绪化，“小汪，我是做了去坐牢准备的，说实话我包里已备好了换洗的内衣。我这一辈子什么挫折没经历过，三次直接从会上被押走，想不到今天……（抽泣起来）老了、老了……以为搞点技术工作会安全些，谁知道又出事了！”他长吁短叹声泪俱下，车到怀仁堂竟然连台阶都上不去了，由我和司机架着他走，犹如赴刑场的罪犯。

刘局长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南海汇报会平安度过，他不但没有被留下坐牢，甚至连严厉批评都没有。说准确些，我们进去时首长们示意坐下后似乎忘记了我们的存在，他们都低头紧张地忙于处理各种应急事务，我们悄悄地坐在边上旁听了一场精彩战地指挥、战地动员会，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

华国锋坐镇中央，几个秘书走马灯似的带来新信息，领走新指示，旁边坐着李先念、纪登奎、吴德等几位帮着出主意，时不时地闯进许多认识、不认识的首长，来去匆匆、神态凝重。

我们最担心的是中央首长问起地震的具体地点与伤亡情况，但奇怪的是华国锋一句话也没问。吴庆彤秘书长告诉我，首长们掌握的情况比你们多得多，在你们进门前刚刚接待了两位来自唐山向中央报信的工人，情况

已经落实，震中就在唐山附近，伤亡十分严重。怪不得我们进门时，吴德看见我们时目光异样与华国锋咬了一会儿耳朵，然后态度和蔼地主动与我们握手并示意入座。他显然已经回忆起不久前胡克实带我向他汇报时再三阐述的“下一次大震可能发生在唐山、滦县一带”的观点，以及他本人“地震就要震到我家门口了”的惊讶。我问坐旁边的吴庆彤：“我们前几次来国务院汇报，尤其关于下一次大震可能发生在唐山、滦县一带的预测意见是否有记录？”

他显然记起了我上次汇报的内容，热烈地握着我的手告诉：“向国务院的汇报，无论文字与口头都有详细的记录，都有据可查的，请放心！”听了吴庆彤的回答，刘局长赞赏地拍拍我的肩膀，他显然已经知道我曾经在中央领导面前提出过下一个地震可能发生在唐山、滦县的判断，尽管地震局没有把这个判断作为官方的声音正式向中央报告，但地震局内部有人认为唐山地区震情严峻的声音事先已经捅到了中央首长面前，这至少说明地震局工作没有彻底被中央否定吧！

最后，临走时华国锋对刘英勇说：“关于唐山地震没能预报出来的原因，应该查清楚。震前科学家们的不同预测意见，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但当务之急是作好下一步震情的分析，开展唐山强余震监测工作，赶快去布置落实吧！”

此时，久经官场的刘局长已经从情绪低谷中逐渐恢复，在这场虚惊中完全解脱出来，开始谈吐自如，上下怀仁堂的台阶也不需要搀扶了。

回到局里，刘局长迅速与先遣部队张魁三副局长取得联系，传达了华国锋的指示，要求他立即向唐山挺进，并通知将派我带着技术骨干随后就到，负责前线指挥部的震情分析工作，完成华国锋交办的唐山强余震的监测任务。

在电话里我与张魁三约定唐山的接头地点是十天前开会的唐山地区招待所。

2. “老子毙了你！”

上午9点从国务院回来，局里从自告奋勇的技术人员中选择了7个人，组成现场指挥部分析组，决定11点出发去前线。

准备行装、交代工作、收集资料、参加会商忙得不可开交，忙乱中我没忘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封存我的全部资料，没有我的同意谁都不能从我办公桌、资料柜中拿走任何材料。这一措施后来证明十分必要，不仅为解读中国地震局争论焦点之一——唐山地震预测与青龙奇迹之谜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真实史料，也为我今后多次遭到诬陷时，为洗刷“罪过”起了重要作用。

总参传来消息，自天津、锦州两个方向派出的救援部队都因桥梁坍塌受阻，目前进入唐山的唯一通道是通过玉田、遵化由北向南穿插进入唐山。我们的小面包就是从部队借来的，司机熟练地克服地震造成的公路上的陡坎、裂缝，颠簸地前进，越接近震中道路越难走，我们几次下沟垫土推车，穿越村庄小道绕行，黄昏时车进入丰润境内，地震的后果越发明显，路边经常有伤员截车求救。

一次，汽车面临一段“搓板路”实在无法行进，司机要求男同志下车垫土、修路，谁知我们刚拉开车门，从道边树林里闪出几个手里拿着铁锹、木棍的青年，宣布汽车已经被他们强行征用，要求所有乘客立即下车，为他们腾出位置。我们司机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厉声喝道：“有没有王法？你们竟敢抢车！”“不是抢，老子征用你的车，用好后还你！”“我们拉的是国家地震局的领导，受中央委托到唐山执行重要任务！”

“地震局领导？”几个字刚一出口就像炸了的油锅一般，遭来一片骂声：“太好了！我爸临死前留下最后的话就是要我找地震局算账。现在我妈也快断气了，你们能见死不救吗？”说话时，他们从树林里抬出一扇门板，上面躺着一个血肉模糊的老太太，后面跟着三五个有严重外伤的人，强行把老太太往车上抬。“地震局的车，我更非要征用不可！”

司机将车门紧闭，说：“你别胡来！车是北京军区的，我是当兵的，我的任务是把首长送到唐山。”

我们几位同事也帮着司机阻拦群众截车，说明我们负有特殊使命，不能耽误。说着说着，截车青年脸色大变，眼里露出恐怖的杀气，突然从腰里拔出手枪歇斯底里地冲着我们叫道：“老子毙了你们！”

千钧一发之际，张郢珍拉着我袖子紧张地说：“老汪，要出事！赶快说服司机打开车门，让伤员上车！”

我们一起拉住司机与姓张的拔枪青年商量，出示了北京军区的通行证，说明我们确实在执行中央任务，希望想一个两全之策既完成任务又救死扶伤。最后双方一致同意大家都挤上车，先去唐山再把伤员送交医疗队。

大家纷纷站起来把座位让伤员们坐，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终于缓和下来，最后小张痛哭流涕向我们赔礼道歉，他说他是当地驻军，老家就在军营附近，地震后回家发现新婚妻子、老父亲都被砸死，只剩下受重伤的老母亲还有一口气，百般无奈只好截车，伤心与绝望使他失去了理智。

汽车拉着十来人挣扎着前进，本来路况极差再加上超载只能走走停停，凌晨两点进入唐山市区，不见一栋房屋、不见一条街道、不见一丝灯光，汽车单凭感觉碾着破砖碎瓦向前挪动，好在小张对本地很熟，他在司机旁边不断介绍这是原来的某某区、某某街，在小张指挥下我们终于到达我与张魁三副局长约定的接头地点——唐山地区招待所。

十几天前我们曾照相留影的繁华的十字路口、雄伟的大门、六层的红砖楼已经荡然无存，我们转来转去无法找到张魁三可能立足的任何迹象。正发愁时，司机发现东边远处有一丝微弱的灯光，犹如茫茫大海中看到灯塔，汽车毫不犹豫直向它开去，到跟前发现是一辆被砸变形的公共汽车，里面点着蜡烛坐着三五个衣冠不整、身带血迹的汉子：

“我们就是唐山市抗震救灾办公室。”

他们告诉我，中央、河北省、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都设在开阔空旷

的唐山机场停机坪上，估计在那里能找到张魁三副局长，救灾医疗队总部也在那儿，伤员们可以交给医务人员护理。

凌晨四时到达唐山机场，果然在中央指挥部的帐篷里见到了张魁三，他与一批军区首长披着军大衣在开会，恢复了以往当兵时的架势，他命令我：“明天震情分析组就开始工作，后天起每天晚上向指挥部报告分析意见，有什么困难？”

我问他：“大家的吃、住如何解决？”

他苦笑着耸耸肩膀：“暂时自行解决吧！我也一天多没吃、没喝、没睡了！”

从中央指挥部的帐篷出来，天下大雨，我们跑向自己的窝——面包车，在那里开了个碰头会，我传达了张魁三的意见，大家开始讨论贯彻执行的具体办法，最后决定：

（1）尽快把流动台架起来，在没建立起来之前，首先利用群测点的资料进行分析。

（2）在面包车没回北京之前，我们就在车里凑合坐着睡觉。

（3）集中所有水壶、饭盒尽量多积累一些雨水，以备急用。

（4）要求大家把现存的干粮统一上缴，由临时支部负责人李贵保管，严格执行每人、每天定量供应。凡出队外区工作时，尽量为我们团队购买些干粮。

3. 树上都捆绑着人

最早到机场与我们取得联系的是曹聿明，他曾是石油部派到中央地震办公室工作的人员之一，在我负责的地震动态组里承担电磁信息分析工作。（曹聿明后来从中央地震办调到河北省地震局，分配到唐山地震局主管电磁项目。）他带来一辆驾驶室被砸瘪、玻璃全无、车门变形无法打开的吉普车，司机只能从窗口钻进去躺着操作。我与他几年没见，这次在唐山地震劫难后见面恍若隔世。

“小曹，怎么样？全家没事吧！”

“什么没事，我现在一无所有，家全毁完了！我还被刮去四两肉呢！”他转过身来，让我们看被预制板深深刮伤的背部。

他住的胜利桥地震局宿舍恰好地处震中附近，几排砖房全都塌平了，死伤人员无数，幸免者寥寥，贾云年等六人就是在此地全部英勇殉职的。他们家的脱险纯属偶然，房屋虽然遭到毁灭性破坏，但房顶并不是垂直下落，而是偏向东斜落的。因此，每排房最西端的那间屋破坏最轻，而曹聿明夫妇恰好住在那间破坏最轻的屋里，预制板斜落时仅仅刮伤了曹聿明的背部，“我们的整个屋顶斜拍在邻居头上，我躺在床上睁开眼就看到了星星”。

曹给了我们唐山地区的台网及群测群防的全部信息，我们可以根据曹的资料进行排查哪些观察员还活着，仪器还能否恢复工作，哪些点彻底报废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了解、核实大震发生前到底出现了哪些异常信息，以便作为判断下一次地震的依据。

由曹的破吉普带路，我们的面包车随后跟着，艰难地碾压着废墟开始了现场分析组的第一天工作。

从机场南下进城首先到唐山八中，这是地震局模范群测点之一，由一对夫妻领导的科研小组做出了出色成绩。男的叫吴葆刚，北大名教授的公子，女的叫周蓁，厦门豪商的名媛，二人都是南开大学核物理系的高才生，因家庭出身问题不适合在保密单位工作，毕业后分配到唐山八中教物理。由于他们专业功底深厚，在轻松完成教学任务后，还有精力辅导多种科研小组的活动。十几天前我们在唐山地区招待所开会时就组织代表们参观八中群测点，请吴、周两位老师介绍经验。后来，他们也请我到学校作了一次学术报告。报告后他们留我在他们家用餐。

这是一顿终身难忘的晚餐，夫妻俩陪客人端坐桌前喝茶聊天，由上初中的儿子掌勺炒菜、熬汤，上小学的女儿跑堂上菜、盛饭。我被感动得几次邀请孩子们上桌一起吃，但两个小孩恭恭敬敬地说：“妈妈嘱咐过，今天

贵宾上门我们负责接待，哪里有大厨与客人同席的。”

踏着泥泞的学校操场挨个窝棚寻找这可爱的家庭时，脑海中不合时宜地出现不久前的欢乐画面。

最后在一个矮小的窝棚里找到破衣烂衫、满脸污垢的周蓁，我完全无法将眼前的模样与她一贯高贵、典雅的形象联系起来：

“小周，终于找到你了，吴老师和孩子们还好吗？”“吴老师受重伤被收容了，现在哪儿我也不清楚。孩子们在床上躺着呢！”我张望了一眼，这矮小的窝棚比狗窝大不了多少，哪能搁下床？“在我们自己家的床上躺着，已经走了，没气了！”

我的心猛然抽搐了一下，怯怯地问：“小兄妹俩都走了？”

几天前为我掌勺炒菜、跑堂端饭，如此聪明懂事的一对小精灵突然离去，我心理上实在难以接受。

“开始都有气，还会说话呢！哥哥最后说‘别管我，先救妹妹’，可是预制板太重，一点办法也没有，在我面前眼看着慢慢咽气的！”周蓁平静地似乎讲着别人的故事。

小曹建议我们一起去把兄妹俩刨出来。

周蓁说：“干吗打扰他们，孩子们向来喜欢在床上打打闹闹，外面日晒雨淋的。”

临别时，她也没忘记履行地震监测的职责：

“大震发生前5—6小时我们的仪器记录到一些电磁脉冲，幅度大、频率高，可能是大地破裂前的临震信号，半夜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过几天我争取到观察室的废墟下找找原始记录，可能对地震预测有用。”

整个谈话过程周蓁像没事人似的，慢声细语、平静安详，但在我们告别窝棚时，背后传来一串压抑许久的撕心裂肺的抽泣声，大家谁也没敢回头。

唐山二中的王老师与周蓁的表现完全相反，她也死了两个孩子，与我们一见面她就抱头大哭，反复描述孩子被砸的具体情况：“孩子腿快，地震

后第一时间就蹿出去了，本来已经脱离危险，可是孩子傻呀，他非要回来拽我！用十几岁生龙活虎的生命换我老太太干吗？傻呀！”

她央求邻居帮忙把孩子尸体挖出来，放在身边守着，在饮用水十分紧缺的时刻，她宁可自己忍着渴，也要一遍又一遍地用净水给孩子们仔细擦洗，决不肯半点马虎。

离开唐山二中，小曹想带我们看看位于胜利桥的唐山地震局宿舍遗址，贾云年等许多熟人都还压在这堆废墟下，来不及处理。车到跟前发现胜利桥已坍塌，桥面斜插在河床上，要过河必须从斜插的桥面上爬过去。

“不行，我们恐怕没这种体力，说实话我们已经好久没正经吃东西了。”“怎么不早说，这好办！你们等一会儿！”小曹向旁边的一堆废墟跑去。一小时后，他拿来一个脏兮兮的布口袋，从中取出一块沾满土坷坷的大饼和几包被压碎挤烂的饼干说：“唐山市抗震指挥部今早通知，在没有建立完善的抗震供应线之前，允许居民到废墟中寻找成品干粮，以备自用。过去这里是一个大食品店，许多老百姓都在这里刨干粮吃。”

黄昏时分我们告别小曹的破车，在回机场的路上突然发现街道变得拥挤不堪，一些军车载着抗震救灾的战士前来支援，邻县许多志愿者开着手扶拖拉机、拉大板车、骑自行车蜂拥而来刨房救人，也有个别以抗震救灾为名趁火打劫的，先从合法的刨干粮开始，逐步发展到刨粮库、刨百货公司，最后竟然明目张胆地砸金店、抢银行。

晚上，我迷迷糊糊地从休息的面包车里出来方便，在漆黑的夜里摸到一棵树旁解手，想不到小便一半忽听有人大叫，我吓了一跳，请司机打开前灯看看究竟，结果发现我们附近的每一棵树上都捆绑着一个人。第二天我们司机从战友处得知，昨晚机场驻军出动，抓了一批趁火打劫者，由于公检法都已瘫痪，根据抗震指挥部领导指示暂时先捆绑在机场周边的树上，随后再交有关单位处理。

连续严打两三天后，地震引起的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局面逐渐得到改善。

4. “这是谁家的胳膊”

大批部队带着大型机械到达唐山以后，救援速度大大加快，几天工夫挖出许多死难者。但把尸体运到郊外掩埋的速度却远远跟不上要求，于是在运尸车通过的主要干道上尸体被陈列成行，排起了大队。家属们为了自己的亲人能早日入土为安，像大医院排队挂号一样经常为加塞、插队发生争吵。加上天气炎热，尸体开始腐烂，强烈刺鼻的臭味弥漫着整个城市。

我们每天清早从机场发车进城工作又遇到新麻烦，刚被清理出来的道路一晚上就布满许多待运的尸体，司机必须小心翼翼地尸体中穿行，否则就可能碾上它们，有时实在绕不过去，我们几个男同志只好主动下车抬尸体。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的李贵来自农村，是有名的傻大胆，我与他达成协议，抬尸体时他负责抬头我负责抬脚。抬脚可以背对尸体两只手像拉黄包车那样走，抬头难度要大得多，必须面对血肉模糊的头，脸对脸地小心翼翼地托起挪动，由于尸体已经腐烂，头颅很容易与躯体断开而脱落。

有一次我与李贵同抬一具尸体，刚轻手轻脚地托起他的头颅，“尸体”忽然坐起来问：“你们要干吗？”吓得我们魂飞胆丧扔下“尸体”就跑。后来了解到那是一位孝子半夜搬来父母尸体在此排队待运，因为劳累过度就在父母尸体旁边睡着了。从此，李贵遇诈尸的笑话流传开来。2011年我在美国休斯敦见到李贵时还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历史，为我们当年的“抬尸的交情”唏嘘不已。

由于来不及掩埋的尸体越积越多，唐山全城成了成千上万具腐烂尸体的堆积场。刺鼻的空气使人窒息，我们睁不开眼，张不开嘴，日不能食，夜不能眠，随之而来的是剧烈的头疼和恶心。为了防止次生灾害瘟疫的发生，我们每天在机场草坪上目睹撒药飞机带着十几吨消毒剂洒在城市上空。腐烂尸体的恶臭混合刺鼻的消毒水味，呛得人难以忍受，我们经常看见十几人集体呕吐不止而虚脱的场面。

我记得在地震后第四天的清晨，我们的车穿过成堆的待运尸体来到破坏最严重的十一度区考察（震中烈度为 11 度），车沿着发震断层由车辆机械厂、第十中学、吉祥路口一直向南到达一个叫女织寨的地方，刚停车，只见一个年轻妇女追赶着几条狗大叫：“这是谁家的胳膊？被狗叼跑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狗叼走了谁家的什么食品，顺着妇女追的方向看去，我才目睹了终身难忘的悲惨一幕，几条恶狗从一具尸体上生生撕咬下整条胳膊，上面还套着沾满血迹的半截袖子，一条狗叼着，一群狗追逐着，从我们前面呼啸而过。从它们直勾勾的鲜红眼睛可以看出，这些狗已经从家畜返祖成为豺狼。

女织寨地处郊区，救援部队一时照顾不到，地震惨状比其他地方更甚，活着的人少、自救能力差，尸体横七竖八到处都是，许多尸体显然已经被恶狗撕咬过。我们十分小心地在村里调研，每走一步都要看看脚下踩的是什么，在这种极端恶劣环境中我们了解到了许多可以载入世界地震史的重要科学资料：

第一次收集到地震发生前后地光存在的人证、物证。

发震断层从女织寨的一块种柿子椒的菜地通过，一个种菜老农民半夜正在出恭，忽然发现不远处的地面发出刺眼白光，几分钟后，伴着巨响，大地开裂、房屋倒塌。我们在他指出发现地光的地区看到了确切的物证，发震断层通过之处绿色的柿子椒全部被烧焦，从烧焦的痕迹看致伤源明显来自断层的下面，距断层两米以内无一幸免，离断层越近烧伤越重，离断层两米以外的绿色柿子椒无一受损。从每个被烧焦的柿子椒来看，面对断层的那一面烧伤较重，而背对断层的那一面烧伤明显较轻。在菜地附近有一水渠，两面栽着两排柳树，断层通过地段的正上方的柳树叶齐刷刷地被烧焦。作为科学样本我采集了满满一书包被烧焦的柿子椒并附有照片说明，带回驻地。今天在唐山地震纪念馆中仍然陈列着我送给他们的“被地光烧焦的柿子椒”照片展品。

第一次了解到被地光伤害的人、畜及其影响。

产生于断层面的地光瞬时形成了一个火球，贴着地面滚进菜地附近一个姓李的农家，农妇患风湿病行动不便正穿裤下炕，火球滚到她脚下，“嘭”的一声烧伤了她的双脚、裤腿与鞋袜，调查时她一一展示烧伤的物件与她的双脚。当火球滚到炕头时，也烧伤了蜷卧在炕边的一只大黄狗，燎焦了它半身毛。

我到大地震现场多次，关于地震前后出现的地光现象，听到描述的多，从来没有取得过确切可靠的证据，这是第一次亲眼看到被地光伤害的人、畜。作为宝贵的科学资料我们一一照了相，采了样。我记得大黄狗凶猛无比，给它剪燎焦的狗毛时，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地光烧伤后，人、畜的生活习性、生理状态变化很大，患风湿病的农妇本来行动不便现在大有好转。原来对主人十分听话的大黄狗现在变得很难驯服，就是它首先开始撕咬尸体，招得全村的狗都开始吃死人的！

第一次确认地震发生前后地下水的“临震回跳”现象。

从邢台地震以来所收集的上百个实例表明，大地震前地下水的前兆典型变化如下：地震孕育阶段由于岩体微裂隙的发育，震中地区地下水水位呈下降趋势，地震发生时因为能量释放微裂隙急速闭合，震中地区地下水水位剧烈上升。对地震预测有重要意义的是由下降变为上升的转折点略早于地震波到达之前，我们称之为“临震回跳”，若能抓住它就能判断地震即将来临，是重要的临震预测依据。但具体在地震前多久水位开始由下降变为剧烈上升？一直只靠目击者的回忆，没有可靠的证据。女织寨菜地有一口 39 米深的机井，盖有井房，地震发生当晚有一崔姓老汉睡在井房看守庄稼，半夜突然井喷，井水把衣服、被褥淋湿。崔老汉回家换了衣服刚回到井房时地震发生了。根据井房到他家的距离我们实地走了一遍，估计需要 12—15 分钟时间。井房有一闹钟，井喷时被大水冲走，那天我们从泥浆中找到已经停摆的闹钟，指针指在 3 点 12 分上，说明井喷发生在地震前 30 分钟左右，与我们根据崔老汉的行动估算的时间相符。

5. 强余震预测的定音鼓

我们在地震现场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寻找确切可靠地震前兆，尤其是短临前兆（地震前几天至几十天的异常变化），为提高地震预测水平寻找可靠依据。为此我们召开了一系列寻找确切可靠地震前兆的座谈会，分别邀请地震专业人员、群测群防测报员、震中地区的幸存者等一起回忆地震前各种不寻常的宏观现象。大浪淘沙、反复筛选，从科学上评估哪些现象对预测地震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哪些现象对预测地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最终从大家提供的数百条资料中筛选出地下水发响冒气、地下水变味变温、地下水水位突变、地下电磁风暴、地面大规模的开裂、人感地动现象成丛出现、矿井下不明原因的矿爆频繁、次声波异常、地声地光、动物行为异常等与地震发生有联系、有预测能力的十大宏观现象。

占第一位的是地下水发响冒气现象，它是根据唐山十中、丰润杨官林、昌黎火车站、北京海淀菜场等四十多个实例总结、提炼出来的，以丰润杨官林的现象最为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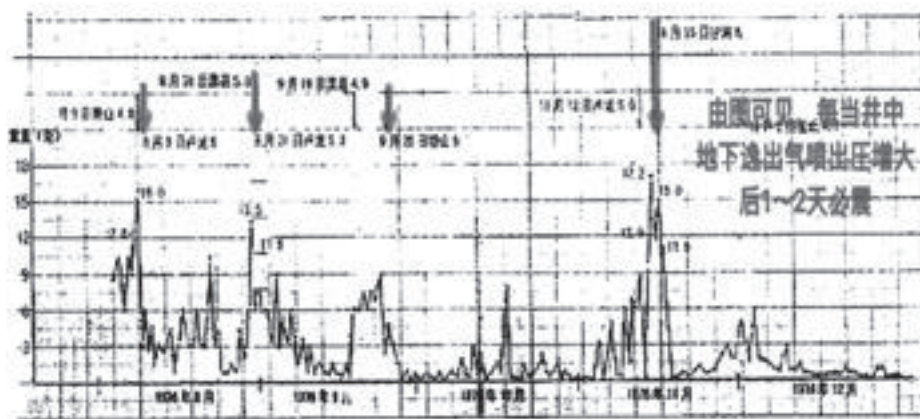
位于唐山以北距离震中 35 公里的丰润杨官林村，在 1958 年村里打了一口百米深井（我们实测仅深 56 米），是全村水质最好的饮用水井，多少年来井旁常挤满打水的村民。从 1976 年 4—5 月开始村民发现井下嘶嘶作响，打手电筒一照发现水面上一阵阵冒出成串气泡。进入 6 月后响声越来越大，打扰得四周居民不得安宁，在村民中流传着“井鸣是大灾的不祥之兆”的流言，村革委会决定抬来一块水泥预制板压在井口，通知暂时停止使用该井，以免不测。大震前二十余天，由于井下逸出气压力剧升，憋在井里面的地下气顶开水泥板强烈外泄，每隔十几分钟顶起水泥板，然后强烈冲击地面如同打夯一样，有多事者在水泥预制板上打了两个孔眼，以为把憋在里面的气放出来就会杜绝打夯声音，不料从此发出时高时低震耳欲聋的气笛声，招来四周邻村都来看热闹。井台的

预制板成了孩子们欢乐的游戏场，聪明的孩子发现抓一把沙土对着预制板上的孔眼撒下去，轻的被气冲飞了，重的落在井台上，只有不轻不重、磨圆度较好的小石块能够被气柱托起悬浮在空中，然而欢乐的游戏没玩几天就发生大地震了。地震一发生井下逸出气立刻像被戳破的气球一样马上泄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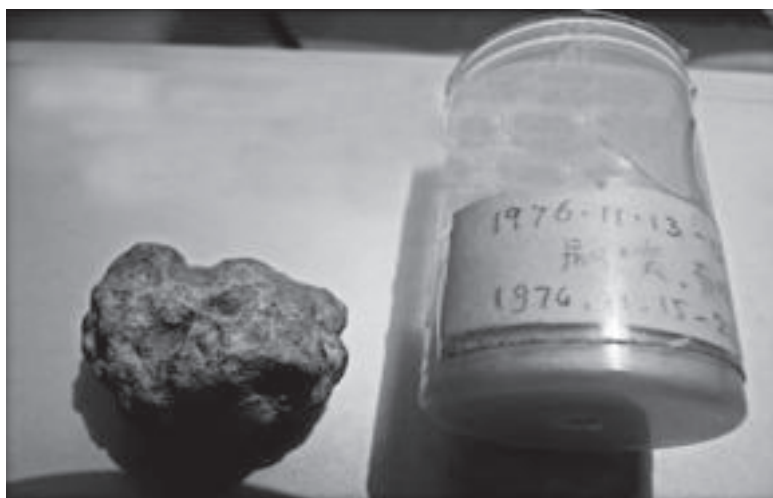
我带了一批专家到现场调查研究后一致认为这很可能是重要地震前兆，于是通知村革委会立即派民兵日夜看守这口井，将喷气情况每日一次向我们报告。为了对喷气力度有比较定量化的描述，我要求守井民兵每天清晨抓一把沙土对着出气孔撒下去，挑选能被气柱托起在空中悬浮的小石子用纸包好，写上日期送到机场来，再从机场找到一个天平称出它们的质量，换算成井口压力。

事实证明杨官林井逸出气确是非常好的临震前兆，每到喷气压力超过一定界限时 1—3 天内一定有一次较强余震，喷气压力低时肯定平安无事。一时间杨官林井喷气压力成了余震预测的定音鼓，几乎一一对应地成功预测了全部强余震。

通过它预测强余震的明显效果，反过来可以证明从 1976 年 4—5 月开始的井响、喷气异常现象，以及震前二十余天逸出气压力剧升现象，确实是可靠的唐山大震前兆。此现象一直持续到 1977 年春天（逸出气渐渐枯竭之前），一直是我们预测唐山强余震的“独门秘器”，最精彩的是利用杨官林井下逸出气成功预测 1976 年 11 月 15 日发生在天津宁河的 6.9 级地震，杨官林井下逸出气在 11 月 13 日突然强烈喷发，可以将重达 47.2 克重的石块顶起在空中悬浮，这是唐山主震后最强的喷气现象，两天后果然发生了唐山主震后最强烈的强余震。



丰润杨官林井喷气动态成为预测唐山强余震的定音鼓，几乎百发百中



1976年11月15日宁河发生6.9级最强余震，震前两天杨官林井强烈喷气，顶托起47.2克重的石头

6. 我的人生第七劫

在唐山地震短、临前兆的群众性普查中，唐山地震局杨友宸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个复员军人，喜欢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不但外表保留军人形象，内心更保持军人作风，对工作勤勤恳恳、雷厉风行，对同志心

直口快、有啥说啥，有人称他为“杨大炮”。

尽管他熟悉业务，在群测群防队伍中有极高威望，但由于不善于迎合上级、常说些“不识时务”的话，领导不待见他。

地震前我们几次来唐山开展调查研究多半是与他直接打交道的，我们一起调查、一起讨论取得共识，认为唐山、滦县一带地震形势严峻，务必引起充分重视，尽量说服领导、动员群众作好应对准备。

也可能他把我们的共同研究的结果传达给领导，要求重视地震预测预防的意见提得太多、太尖锐而引起领导不快，在唐山地震前的关键时刻，最熟悉情况的他竟然被突然调离了地震工作岗位，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地震后才紧急调回岗位。我们俩可以说经历过同样处境，遭受过相似的尴尬、纠结与无奈。

大约在8月底杨友宸告诉我，大震前唐山地区井下喷气现象绝不止杨官林一处，据他了解唐山钢厂化验室大震前也多次反映过井鸣、喷气的现象，并且取了气样进行化验，现在测报员被砸死了，要了解详细情况唯一的办法是到废墟中找到井孔观测记录和喷出气的化验单。他实地勘察过化验室，发现还没有完全倒塌，里面存放资料的柜子似乎还在破房子里立着，我们决定冒险进去把资料抢出来。

8月31日他带来一辆车，我们一起向钢厂化验室出发，司机熟练地在废墟中东绕西转地来到一片危房的警戒线面前，半截墙上用石灰写着“危险，严禁入内”字样，杨友宸指着不远处一堆废墟说：

“这原来是四层的楼房，现在叠落在一起了，化验室在一层，里面的资料柜还支撑着呢，只要冒险钻进去，就可能抢出资料。”

老杨熟悉情况，我身体比他好，我们俩争执半天最后决定都上。因为我们发现有些障碍需要一人踩在另一人肩膀上才能翻越。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踩着晃晃悠悠的预制板，小心翼翼地爬过钢筋外露的断墙残壁，终于来到原来的化验室，发现几个装资料的铁皮柜都完整无损，只是铁皮柜打造得太结实了，以至于我们用水泥块砸、用钢筋撬都无法打开柜门。老杨

想起汽车工具箱中有把撬杆，他自告奋勇地爬回去取撬杆，我一人在资料柜边等着。就在老杨离开几分钟后忽然轰隆一声天晃地动，断墙残壁纷纷倒下，扬起的灰尘呛得睁不开眼、喘不上气，我立刻明白发生了强余震，下意识地躲在铁皮柜边，用上衣包着头、捂着嘴。这时第二次更强烈的震动接踵而至，四周几块大预制板噼里啪啦地砸在我躲避的资料柜上咚咚作响，我倚靠的资料柜发出嘎嘎的破裂声，破砖、墙土倾盆而下，空气中顿时充满土屑粉末，眼睛、鼻子、嘴巴全是泥土无法呼吸，我拼命用上衣捂着嘴巴不让泥土呛入肺中，但仅仅坚持几分钟胸部就憋得似乎要爆炸，喉咙如同塞满鸡毛呛得恶心。我隐隐约约想起许多死于地震的人全身并无外伤，但青筋暴起，医生告诉我多数亡者死于尘土呛入肺中缺氧窒息，难道我今天也难逃此劫就将在唐山光荣牺牲了，想着想着由于窒息与惊吓我逐渐迷糊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仿佛从梦中听见有人在喊：“汪教授，汪教授！没事吧？”我勉强地睁开眼透过重重尘雾看见老杨与司机冒着强余震后此起彼伏的倒塌声艰难地爬进废墟。据老杨说当时我的下半身已经完全被埋在土中了，万幸的是脑袋还在外面，他们艰难地把我从一堆沙土中刨了出来，发现一块几百斤重的预制板在离我脑袋仅仅几厘米的地方砸了下来，是坚固的铁皮柜替我扛住了预制板的猛烈打击，我安全无恙而预制板却砸开了铁皮柜的门，现在我们伸手就可以拿到资料，不需要费劲撬锁了。

他们把我扶到汽车旁，司机找来一盆水，把我淋了个落汤鸡，我顿时头脑清醒了许多，但仍然感到全身乏力，非常犯困，他们把我送回机场由李贵、张郢珍等同志找来地震救护队的大夫给我打了两针，整整昏睡了一整天才缓过来。几天后鼻子、耳朵、嗓子里仍然不断清理出许多血痂与污土，我亲身体会了一次被地震废墟埋葬的经历与感受，到阎王殿前转了一圈重新回到人间。

就这样，我又平安渡过了我的人生第七劫。

7. 我们成了“漏报犯”

自从“老子毙了你”事件以后，我们对外一律都打着中国科学院调研组的牌子出去工作，凡是不小心透露出国家地震局旗号者轻则遭到白眼，拒绝供应食品、饮水（唐山地震后一段时期，唐山附近几个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对救灾人员免费供应饮食），重则遭到人身侮辱、恶言辱骂甚至拳打脚踢。群众的这种过激举止是由于他们对地震预测工作缺乏了解，是由于失去亲人极度悲伤而引起的失控，我都能理解。

但最令我痛心、气愤的是我们内部有些人，尤其局机关的一些行政管理人员在群众、地方政府对地震工作极端不满的压力下，不但不耐心解释、相互支持、同舟共济，反而落井下石、撇清自己、嫁祸于人。但在我们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也有不少正直的科学家纷纷对京津组的工作点赞，对我本人给予热情的鼓励与支持。

一天，机场指挥部震情分析组召开例行震情会商会时，帐篷里钻进来一个高大的胖子，自称是马家沟矿群测群防点的马某某，要求发言，他说他在唐山地震前发现地电仪记录很不正常，于是向唐山市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乃至国家地震局上报了“唐山市近期有大地震的预测意见”。据他说，为此国家地震局京津组还专门派来了两位专家到马家沟矿群众测报点进行了调查研究。两位专家从下车开始极力否定这个异常，临走时还说：“这么大的变化不可能是地震异常，若是地震前兆不就要把唐山市震翻了吗？”

“由于他们是权威，他们推翻了我的正确意见，使我放松了警惕，导致地震时我母亲、女儿被砸死。”

他说着说着从书包里掏出一件血衣号啕大哭起来，说这是他妈临死前穿的衣服。会商会变成了控诉会，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旁边围观群众中有在地震时死了家人的气愤地喊：“谁是地震局的，揪出来，血债要用血来还！”

一个地震局后勤干部生怕火烧到自己身上，立刻把我供出来：“我只是地震局干后勤的，什么也不知道，主持会议的是我们保卫京津组组长！”此话一出，会议秩序大乱，许多围观的群众涌进帐篷把我团团围住。

“为什么有人预报了，你们不通知我们？”

“你们保卫京津组是干什么吃的？”

“死了这么多人，你们必须向唐山人民作出交代！”

我感到背后被人重重踢了一脚，接着身上又挨了几拳，我一个趔趄被打趴在地上，混乱中我双手死死地护着头，缩着身体任凭身上承受来自四面的打击。幸亏附近解放军闻声赶来，驱散群众平息了混乱。

后来，我问马某：“你什么时候向国家地震局发布的预测？若打电话你得告诉我是谁接的，我可以查记录，若写信你得告诉我回执的编号是多少，这种重要的预测意见我们都正式登记入册，寄返回执的。但事实上是我从未听说过你的预测，更没有专门派过专家到马家沟矿作过任何调查。”

马在我反复追问下只好承认：“我没有直接报给你们，我是向河北省地震局、唐山市地震局反映，请他们替我向上级传达的。”

我又问河北省地震局分析组长罗兰格、唐山市地震局主任杨友宸，他们也都否定地震前收到过马的预测，据杨友宸说：“他曾反映过发现异常但没有明确的预测意见。”

此事总算弄清楚了，但多年后有些人又把此事反复炒作，以讹传讹致使京津组副组长钱复业等同志遭受极大精神压力，几十年背着“漏报犯”的黑锅。

老百姓对地震局的不满在地震局内部都转化成对京津组的指责与歧视，硬把我们推上唐山地震灾害的替罪羊位置，作为群众愤怒攻击的挡箭牌。分析组同志们多次向我诉苦，地震局机关许多人认为，地震局日子不好过主要是京津组工作失责引起的。在唐山机场我们日夜加班忙得团团转，他们一杯茶、一支烟、下棋打扑克，开饭时他们排队抢好菜，给我们留下冷饭剩菜，宿营时他们挑通风遮阳的好位置，给我们留下闷热曝晒的床位。

更可气的是国庆节、中秋节从北京送来大批全国捐献的慰问品、文工团演出的慰问票，他们近水楼台先分了，等工作结束后已经所剩无几，他们还公开说：“这些漏报（地震）犯们，还有脸来拿慰问品，看演出？”同志们纷纷诉苦、埋怨，我实在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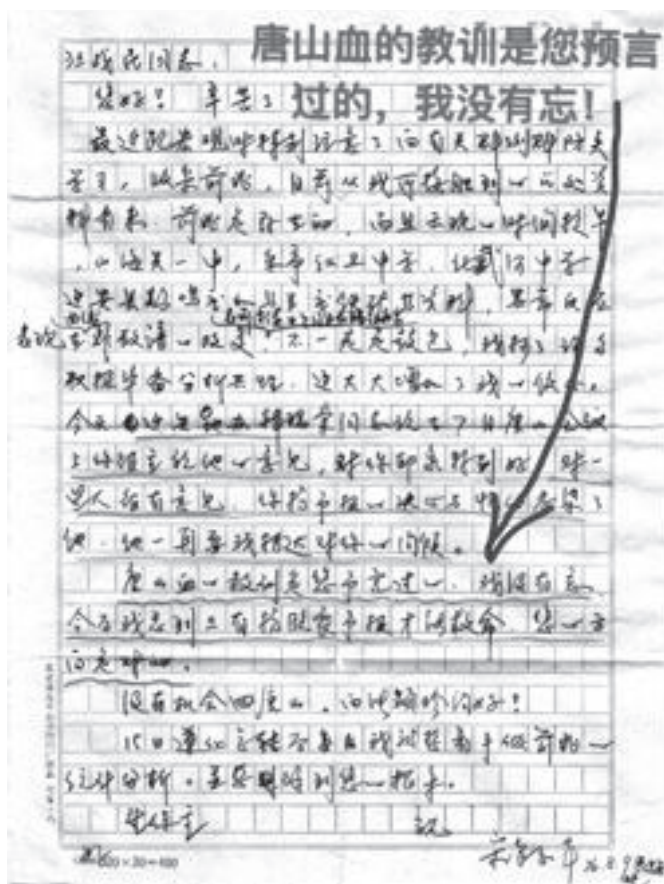
由于我们通过杨官林井喷等许多前兆现象连续报准了多次强余震，1976年10月，指挥部决定给我们组授予抗震救灾先进集体称号，通知我去汇报、领奖。听汇报会的有北京军区的首长、抗震救灾指挥部几位领导和地震局张魁三副局长等，当我汇报结束领导们对我们工作表示感谢时，张魁三突然说：“小汪是我们局的保卫京津组组长，最近报准了几次强余震，也算是他戴罪立功吧！”

我一听当场就火了：“张局长你的话错了，我到底有什么罪？要说错误，地震局领导确实有错误，我几次打报告都指出唐山、滦县一带要出问题，你们就是不听，我不得不写大字报呼吁你们千万要重视当前震情！那次大字报事件不是你亲自处理的吗？现在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测如何？”

张魁三显然没有料到平日温和的我突然发难，他脸憋得通红说：“你虽然提过唐山、滦县一带有问题，但说得不明确，只说5—6级，谁知道这么大？你也没拍胸脯对我保证一定要出事，否则我早给中央报告了！”

“地震预测是世界难题，不仅我汪成民，全世界没有一人敢拍胸脯预测地震的，我们只讲倾向性判断，提供给领导，由你们作出决策。海城我们也仅报5—6级，由于辽宁省领导正确决策，发生7.3级大震后，国家不但不批评我们强度预报低了，还为我们立功授奖。这一次我们明确提出唐山、滦县这几天内有5—6级地震，预测水平一点也不比海城差，但你们就是不敢决策、不向中央汇报，问题出在你们领导那里。周总理要求我们力争在地震前打个招呼，我的大字报和以多种形式向上下通报震情难道不是在打招呼吗？我们京津组工作经得起任何检查，没有什么过失，更谈不上戴罪立功！”

我随即拿出当天刚刚收到的宋良玉信递给他：“张局长，我今天收到你的一位熟人的信，你看看她是如何认识唐山地震的失误的！”张魁三局长与宋良玉很熟，他们多次一起出差、开会，张魁三扫了一眼这封信后默默无语了。



曾支持华北地震“将逐步缓和”观点的宋良玉研究员在唐山地震现实教育下向我写了一封沉痛反思的信

接着，一位北京军区作战部的首长站出来为我辩护，当场向张魁三证明他确实曾经在四五月份听过我两次报告，十分欣赏我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唐山、滦县一带要出问题的科学见解与无畏勇气，他说若按照这些意见哪怕给中央打了个报告，就不会如此被动了，事实证明中国地震局保卫京津

组工作是十分出色的。我看见张魁三局长低下头，面有愧疚之色。

张局长毕竟入党多年，是一位忠诚、正直的老共产党员，他多次听取过我与老梅对震情判断的争辩，承认看见过我贴的大字报，对唐山地震预测的分歧心中是一清二楚的。因此，自从那次顶撞他以后，我们关系不但没有疏远反而一直保持着很好的私交，在后来的几十年的交往中，他处处暗中保护着我，鼓励我不要气馁，指导我躲开各式各样的暗礁。

三、青龙奇迹的始末

1. “我们县一个人都没死！”

大地震后由于唐山市遭到毁灭性破坏，一切活动都转移到唐山机场进行。10月的一天，机场跑道旁边用杉杆搭起了临时戏台，抗震指挥部召开抗震救灾先进事迹表彰大会，会后有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慰问演出。我们分析组承担着强余震的监测任务，大家都紧张地在帐篷里处理数据，准备一天一度的震情会商会，顾不上去看演出。

忽然，我无意地听到从大喇叭传来的会场声音：“请荣获优秀救援队的青龙县民兵代表讲话！”

“我们青龙县由于事先有预报，全县人民在地震前已经撤到房外居住，作好了应急准备，因此唐山大震后我们能最早组织救援队，第一时间进入唐山救援……”

我一下子兴奋地跳了起来，拉着旁边的张郢珍：“小张，听见没有？青龙县事先有预报、预防！！”

她一门心思在处理地形变的数据，似乎什么也没听见。我急忙钻出帐篷跑到会场找到大会主持人问：“刚才讲话的青龙县代表在哪儿？”

主持人把我领到一群农民打扮的年轻人中间，指着一个穿黑色对襟上衣、带着大红花的敦实小伙说：“就是他！”

“你详细给我说说，你们是如何在地震前作出预报的？如何预防的？”

“请问，你是谁呀？”

“我是中国科学院调研组的。”我下意识地不敢暴露身份。

“打听一下，这里有没有国家地震局的？我们要找个人。”

我看他态度诚恳、情绪稳定，不像是要找地震局麻烦的，就说了实话：“我就是国家地震局的，我叫汪成民。”

我发现这群年轻人像触了电似的突然骚动起来，眼睛里发出惊奇的光芒。

“你就是国家地震局保卫京津组组长汪成民？！”

突然前面两个小伙抱住我的腿双膝跪下磕起头来。我顿时被吓得不知所措，连忙扶起下跪的小伙：“有话慢慢说，千万别这样，我经不起！”

“青龙全县都知道，我们能躲过这场大灾难多亏了两个人——我们县的冉书记和国家地震局的汪组长，我妈嘱咐过见到这两位恩人时一定要下跪磕头，谢救命之恩！是你们拯救了我们，使我们全县一个人都没死。”

“全县没死一个人！是不是离唐山比较远破坏比较轻？”我惊喜地问。

“离得不算远，仅 110 公里，和我们距唐山同样远的周围各县没有不死人的。破坏程度当然比唐山轻，但房屋倒平的、严重破坏的也很多，假如没有预报、预防，估计至少要死伤几千人，结果除地震时因犯心脏病吓死一个老年人外，一个人都没被砸死。”

大家兴奋地席地而坐，聊起青龙奇迹的详细经过。

2. 尽心尽责的王春青

事情回溯到地震前十几天，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的华北地区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我通过艰难争取来参会，要求在大会上发言通报震情的意见，遭到主持会议的领导拒绝，经过与会务组商量，勉强同意在晚上召开震情座谈会，代表们可以自愿参加。

7月16日下午4点左右，会务组才贴出通知，租了会议室。或因通知得太晚，或因天气炎热，代表都在乘凉、洗澡、看电影，到7点多了来的人

还很少，我请会务组周英志同志帮我挨门挨户去喊了一喊，结果仅催来大概三十个人。来得最早的是一位穿着军内衣的退伍军人模样的憨厚年轻人，他早早地静坐在角落里摊开笔记本认真记录着每个人的发言。由于参加座谈会的人太少，我要求在7月18日晚上再召开一次震情座谈会，结果又来了三十人左右。整个会议代表共320人，我估计参加了震情座谈会的人约占代表总数的五分之一（有的人两次座谈会都参加了）。一个退伍军人模样的憨厚年轻人两次座谈会都参加了，虽然他不哼不哈地坐在角落里，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我才知道他叫王春青，是唐山附近青龙县的地震办公室的负责人。正是这个不起眼的憨厚年轻人，在创造青龙奇迹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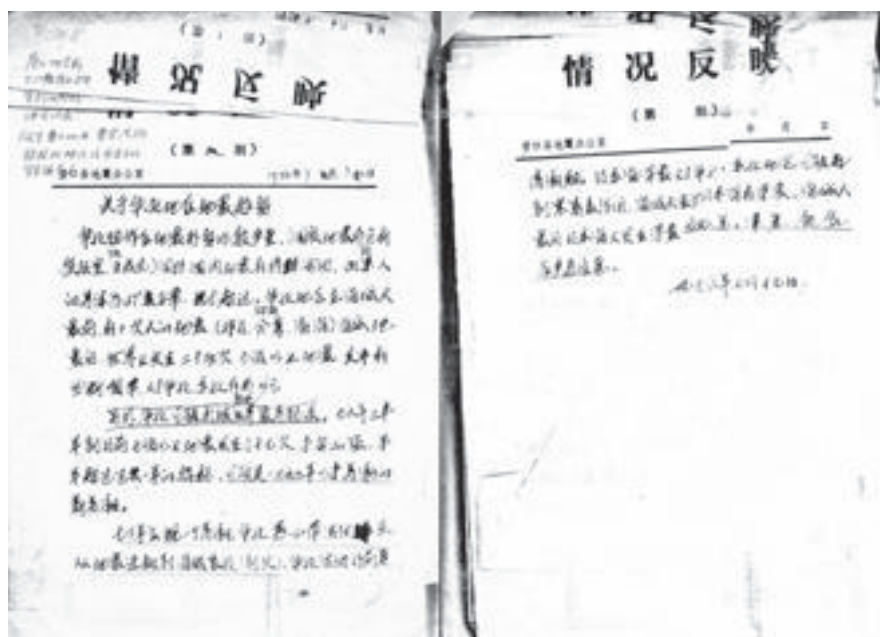
与王春青同志的合影

所谓青龙县地震办公室实际上就一个人，挂靠在县科技局内办公，大家叫他“地震人”，在县政府机构里是个最基层的办事员。由于他对工作的高度负责精神，当他听到我的震情通报后，立刻敏感地抓住核心的几句话记录在他的笔记本上：“国家地震局保卫京津组组长汪成民说最近本地区震情形势严峻，在7月22日至8月5日可能有5—6级地震，下半年可能有

更大地震发生。”

两次座谈会我发言不少，但我牢记支部书记周锐批准我来唐山出席会议的要求：“在会上说话要十分谨慎，若谈震情必须全面、客观，不能只谈你的个人观点，你的身份很敏感，否则把京津地区搞乱了，是有严重的政治后果的。”所以我报告的口气是平和的，内容是全方位的，既谈了自己的有震的依据也介绍了反对者的观点，从这种“全面的”震情通报中抓住我的本意需要十分灵敏的嗅觉与高度的责任心。唐山地震后，我广泛收集参加座谈会代表的记录，看他们是如何理解我的发言内容的，结果发现王春青等十几人的记录抓住了核心和关键。

曾在海城地震中立功受奖的营口市地震办主任曹显青更能理解我的原意，他听了我的发言后当晚就向营口市革委会、军代表打紧急报告：“国家地震局保卫京津组组长汪成民认为华北可能将发生打破历史纪录的大地



1976年7月17—18日营口市地震办主任曹显青听了我在唐山群测群防会议上的通报后，连夜给营口市政府打报告，称国家地震局京津保卫小组组长汪成民说：目前形势严峻，华北可能要发生打破历史纪录的大地震

震。”对于多数地震权威有关“根据三千年地震记录的统计认为海城地震后华北地震活动趋于平静”的观点，我是持反对意见的。曹显青显然是正确理解了我的态度。更令人佩服的是，会后他来到我的房间刨根问底地问我：“汪教授，你的预测有漏洞，你说这几天有5—6级地震，下半年有更大的，可是今天是7月18日，已经是下半年了啊！”

我告诉他我这趟来，支部书记周锐下达了不准搞乱京津地区的死命令，我们只好学习海城地震的预测办法，取一个保守震级，强震来了能挂上钩，不来对群众惊动也不大。至于预测时间的重叠是我不得已而为之的伏笔，表面上报5—6级不违反地震局领导要求，下半年可能有更大的的是为一旦发生强震留有余地。在地震局干了多年，对地震预测经常受政治行政干预深有体会的曹显青立刻会意地笑了。

王春青带着地震预测信息7月21日回到青龙，他第一时间找到县科委主任王进志汇报开会内容，两人一致认为地震是件大事，拖延不得，必须争取尽快让一把手亲自听汇报。那几天青龙县一把手冉广岐天天下乡作调研，全力以赴准备召开“农业学大寨”大会，王春青过去从来没有单独向冉书记汇报过工作，未免有些胆怯，现在身负重责的他顾不了这许多，频繁来到冉书记办公室去围堵，那边科委主任王进志也通过冉书记的秘书通报有紧急情况要求立即汇报，在多方努力下7月23日冉书记终于抽空亲自听取了汇报，冉书记敏感地意识到问题严重，果断地决定采取预防措施，由此拉开了青龙奇迹成功的第二幕。据初步了解，震前把我的预测意见及时汇报给地区、市、县第一把手的，不止王春青一个，但仅仅只有青龙县冉广岐书记采取了预防措施，其他领导或没有引起重视，或等待上级指示而错过了战机，当然，也有些代表根本没来得及汇报。

3. 敢于担当的冉广岐

据王春青与王进志的回忆，冉书记听取了震情汇报后立即表态，沉思了好大一会儿才布置科委用最快速度了解青龙全县群测群防点的变化

情况。

一天以后情况摸清楚了，全县 26 个地下水、地电、地磁、地倾斜观察点中有十几个处于异常状态。其中冷口与干沟店两眼泉水变化最明显，冷口翻花冒泡水温剧变，干沟店泉水混浊如泥浆。

关于冷口泉水的变化我在 6 月份已经收到过报告，因此我在唐山三次调研时专门到冷口去调查。7 月 12 日收到群众测报员寄来的异常照片。冷口泉位于唐山与青龙交界处，平日泉水清澈透底，温度为 37°C — 39°C ，是当地有名的澡堂，从 1976 年 4 月开始泉水隔三岔五地发浑，到 6 月泉水持续发浑、冒泡，出水口还吱吱作响。据经常在此洗澡的老乡反映，泉水温度明显比往常要高许多。我们 7 月 8 日实地调查证明老乡反映的情况属实，我们用高精度水银温度计测量是 42.2°C ，温度比平日升高了 3°C — 5°C 。

7 月 24 日召开青龙县党委会扩大会议，除了 5 位县党委委员外，还邀请县科委王进志参加，首先由县科委王进志汇报了情况，接着冉书记提出要采取防震措施的建议，希望大家发表意见表明态度。会议陷入一片沉默，大家心中都明白这一决定的分量，可能为今后一辈子的仕途之路挖下大坑。当与会者面面相觑，犹豫不决时，冉书记严肃地说：



1976 年 7 月 26 日（唐山地震前两天）冉广岐书记亲自指挥全县百姓防灾减灾（《青龙日报》记者摄于 7 月 26 日）



青龙县原地震办公室主任王春青对此事的回忆录，青龙县原科委主任王进志有关此事写的回忆录，刊登在《中国地震报》1991年7月25日 7月25日

“采取不采取措施开始我也犹豫不决，谁不想平平稳稳过日子？现在是事情找到我们头上来了，党和国家把青龙县47万老百姓交给我们，俗话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何况这次行动上有中央的69号文件的精神与中央领导的一系列指示，下有群测群防点观测到异常的资料为依据，汪成民教授的震情通报虽然他说明是代表个人的意见，但国家地震局保卫京津组组长的头衔是有影响力、权威性的，可以看成来自官方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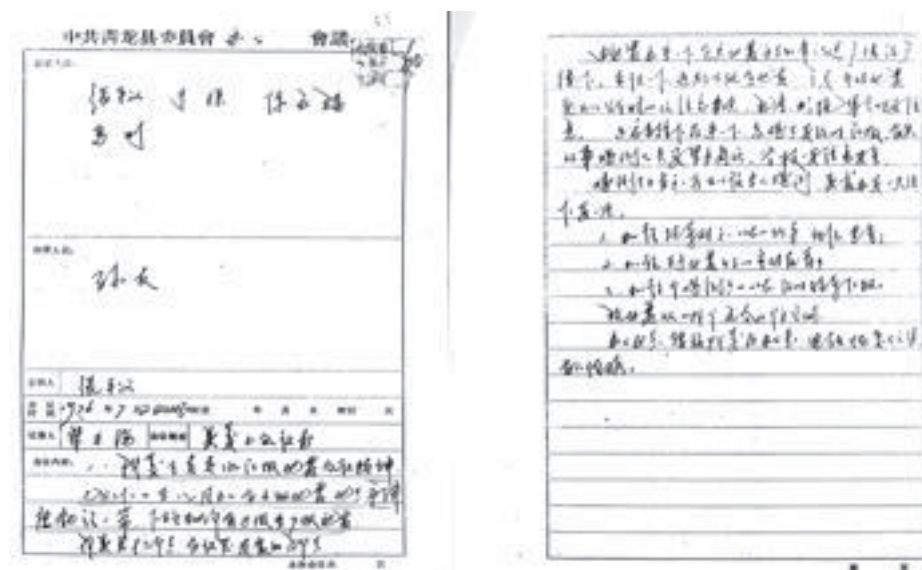
有人提出地震预测不过关，把全县老百姓惊动出来，万一虚惊一场，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冉书记坚决地说：“现在天气很热，动员大家搬出来住几晚，我看问题不大。若发生地震我们就幸运躲过一劫，若没地震上级责怪起来由我向领导检讨，老百姓埋怨由我向群众解释。”

话说到这地步，大家都基本同意冉书记的意见，但还是有人提出，

不要着急采取措施，应该先请示上级，了解一下周围邻县的动向后再行动。

冉书记说：“向上请示，向兄弟县了解情况都很必要，但根据邢台地震教训，防震减灾如同打仗，要急事急办，千万不能延误战机。根据防震减灾法的要求，在地震形势紧迫情况下，允许县一级地方政府有自行决策、采取措施的权力。今天是 24 号，已经进入发生地震的危险时段了，随时可能出问题，因此我们决不能等待，就一边请示一边采取措施吧！”

最后青龙县党委会扩大会议一致同意，通过了立即在全县范围内采取防震措施的决议。



1976 年 7 月 24 日（唐山地震前四天）青龙县委听取地震办主任的震情汇报后，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在书记冉广岐同志力挺下通过了果断采取防震措施的决议。这是档案馆存档的有关这次会议的记录

(1) 利用 25 日召开“农业学大寨”三级干部会议的机会，安排防震减灾动员报告，宣读县党委会扩大会议的决议。

(2) 行政村以上的单位立即抽一名主要领导负责抓防震减灾工作。

防震减灾，作为当前民兵队伍主要任务。



从 7 月 26 日起（唐山地震前两天）商店已在临时建筑中售货（《青龙日报》记者摄于 7 月 26 日）

(3) 地震办公室采取 24 小时值班制度，强化群测群防点的观测，有情况随时报告。

(4) 从 7 月 26 日起学校一律在操场上课，商店在外营业。

(5) 从 7 月 26 日起动员群众不在屋里过夜，尤其对于居住在老、旧、危房中的居民，由政府安排民兵搭建窝棚协助安置。

(6) 立足有震，随时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两天后，唐山大地震发生了，虽然造成青龙县倒房七千余、损毁十八万间房，但由于震前采取了强有力的防震措施，取得了一个人没有死于灾害的奇迹，与唐山周围各县共死亡 24 万多人形成鲜明对比。

1995 年，为了纪念即将到来的唐山地震二十周年，由联合国发展援助与管理服务署官员 J.M. 科尔博士以及世界十年减灾委员会主席埃罗教授带领的“中国青龙奇迹调研组”来青龙调研时，从县档案中调出了 1976 年 7 月 24 日青龙县党委会扩大会议的原始记录与 1976 年 7 月 24 至 27 日的《青龙日报》的新闻报道与图片，这些资料生动、详细地记录了青龙奇迹创造过程中的每个细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唐山地震的青龙奇迹是中国人民为世界灾害史提供的一个光辉典范。

4. 青龙奇迹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每当我们谈起青龙奇迹，许多媒体都会提出同样的疑问：

“参加唐山7月群测群防会议的人很多，为什么只有青龙县采取了措施，避免了伤亡，原因何在？”

我认为任何重大事件的发生都有它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海城地震如此，松潘地震如此，青龙奇迹也是如此。

要取得一次有减灾实效的地震预测、预报，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

- (1) 地震前捕捉到地震可能即将发生的某些信息。
- (2) 通过综合分析提出与事实相符或相近的结论。
- (3) 当地政府正确决策，当机立断地采取对应措施。

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的“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大打人民战争”“广泛实践、多路探索，多兵种联合作战”的地震工作方针已经解决了在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把捕捉地震信息的能力发挥到极致的途径。海城、龙陵、唐山、松潘等十余次地震检验，证明我国捕捉地震信息的能力大大高于世界先进水平。尽管近年来这套方针、路线已经被阉割得支离破碎，但通过汶川、玉树、雅安、鲁甸等地震可以见到周恩来总理给我们留下的这份遗产仍然在发挥影响。在上述每次地震前都能捕捉到或多或少的地震信息与比较正确的预测。

但这些信息大都是杂乱无章、鱼目混珠甚至是相互矛盾的，需要专家们进行筛选、提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开展信息集成的综合分析才能提出比较科学的结论。中国地震局有一大批在李四光、翁文波多年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富有实践经验的预报专家，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不缺乏人才。

中国的各级政府组织都有很强的执政能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是我们的看家本事。我记得1979年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地震预报科学大会上，当我们介绍海城预测预防成功经验时，许多国外科学家纷纷发言称赞中华民族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羡慕中国政府的卓越管理能力，

他们一致认为人类第一次对破坏性大地震预测预防成功出现在科学水平相对不高的中国不是偶然的，中国政府动员组织群众的超强能力弥补了科学技术水平的不足。

所以，这种大的气候环境下在海城地震以后又出现青龙奇迹绝对不是偶然的。即使没有冉广岐、王春青与我们，也早晚会有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创造出第二个、第三个防震减灾的奇迹来。

但具体就青龙而言，当然有它偶然性的一面。所谓偶然性是指这次成功是三个环节的紧密配合、巧妙衔接的结果，也就是坚持实践、不趋炎附势的专家们，恰好遇到了认真负责、忠心耿耿的王春青，又恰好遇到了一心为民、敢于担当的冉广岐，这三个环节缺一不可，并且要达到天衣无缝的巧妙组合。

这三种人在他们的同行中都属于个别现象，是与主流团队很不一样的“另类”，目前在我们社会中这种人并不多。当三个“另类”聚在一起完成同一使命的概率是小之又小的。

在头衔高真理就多，迎合权威意图、服从多数人意见蔚然成风的中国科技界，像我们那样不识时务、不服权威、不随大流的人数不多。

在“一杯茶、一支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为座右铭的混事儿队伍里，像王春青那样不知好歹、自讨苦吃、办事认死理、一根筋的人数也不多。

在附势避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视听话求稳为仕途第一要素的官场里，像冉广岐那样一心为民、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的父母官更是罕见。

这三种人凑巧在一起通力合作，迸出的火花造就了这场震惊世界的防震减灾奇迹。

在听过我通报震情的数十人中像王春青那样认真负责，千方百计地抢在地震之前把信息汇报给领导者有十几个人，多数人或视为耳旁风不把它当回事，或因无法在第一时间向领导汇报而延误战机。

十几个在大震之前已经获得地震信息的领导中，大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不予理睬，或唯恐惹上麻烦。唯独冉广岐视人民生命高于自己仕途，勇敢地担当起来，最终挽救了整个县的百姓。

分析产生青龙奇迹的三种人、三个环节后发现，在现今社会中出现冉广岐式人物难度很大。以汶川大震为例，李有才等专家相当于唐山地震前的我们，独排众议，坚持自己正确意见，反复向各级领导各级部门通报震情。潘正权等基层地震干部有点像唐山地震时的王春青，不考虑个人得失，坚决把临震信息郑重地捅给了震区地方政府，可惜无论汶川、都江堰、德阳还是其他在震前曾经收到一些预测信息的周围的市、县中都没有出现一个像冉广岐那样敢于担当的领导干部，否则第二个青龙奇迹可能在汶川地震中重现（详见本书第五部分）。

汶川地震后，中组部张全景部长受中央委托就“如何在大灾面前做一个优秀共产党员”作调研时，了解到“青龙奇迹”时非常感动，他亲自到青龙县、唐山市、河北省作了大量调查研究，高度评价了“青龙奇迹”，称赞冉广岐是在大灾面前的焦裕禄式的人物，张全景部长给中央的调研报告明确指出：“从冉广岐和汪成民等人身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他们就是认真贯彻党的指示，有坚强组织纪律观念的干部；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是关键时刻敢于负责，有担当精神的干部。在他们身上，真正体现了我们党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

“我们应当大力选拔任用像冉广岐、汪成民这样的干部，这种干部越多，我们的事业就会发展得越好，我们就能够‘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汶川地震后，中组部张全景部长对“如何在大灾面前做一个优秀共产党员”进行调查研究中，热情称赞了“青龙奇迹”，认为冉广岐同志是大灾面前焦裕禄式的英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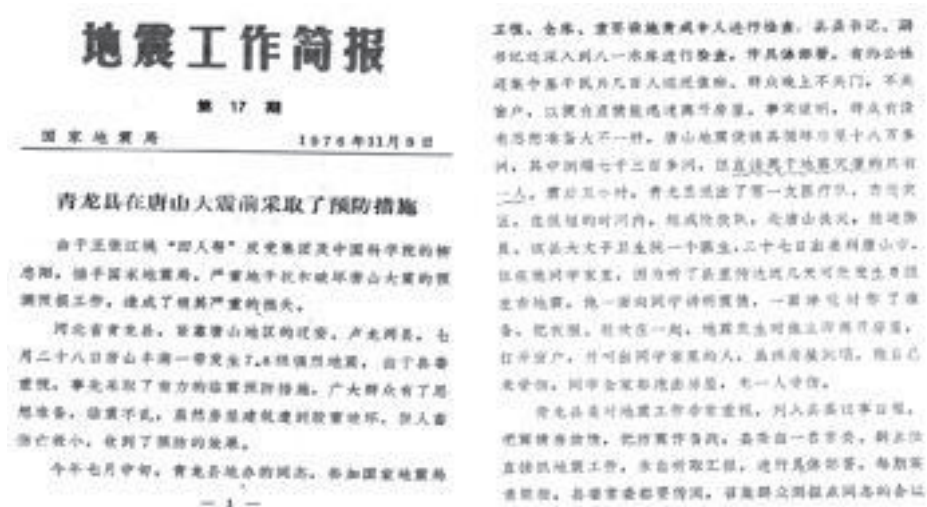
作者与张全景部长一起



张全景部长委托伍一曼与秘书探望重病中的冉广岐，称赞他为“党的好干部，群众的贴心人”

5. 地震局的 17 号简报

1976 年底，我在唐山地震现场收到地震局京津组捎来的一包材料，从中发现一份地震局简报，是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抄送国务院各部委、解放军各总部的最高规格的那一种简报，局机关处室各一份，由主要负责保管。题目是“青龙县在唐山大震前采取了预防措施”，编号是震发〔1976〕17 号，签发日期是 1976 年 11 月 8 日。



1976 年 11 月 8 日国家地震局向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第 17 期《地震工作简报》，通报了唐山地震时距震中 120 公里的青龙县由于事前采取预防措施房屋倒塌、损坏 18 万间，仅一人死亡的消息（后调查该人死于心脏病发作）

简报中报道了与唐山邻近的青龙县，由于地震前有预测、预防，提前动员居民搬到屋外，虽然震时房屋倒塌七千余、损毁达十八万间，但仅死亡一人的特大新闻（注：后来经过落实此人死于心脏病发作，而非死于地震）。简报只简单报道了此事的结果，没有交代来龙去脉。在谈到地震预测的信息来源时仅仅含糊地提到青龙县代表在国家地震局召开的会议上获悉近期有地震的消息云云。

这份简报的内容披露后，在刚刚埋葬了 24 万人的唐山灾区立即引起轰动，一些死亡者家属纷纷到河北省、唐山市等各级革委会责问此事。张魁三告诉我：“唐山地震后国务院领导对地震局工作十分不满，但这份简报送上去后情况立即有了缓解，简报中没有提具体细节，一是为了保护你不暴露在群众舆论旋涡中，二是为了保护唐山市、河北省不至于陷于被动、尴尬局面。”

后来了解到事情远没有张魁三说的那么简单，当我在唐山机场的半年里，围绕唐山地震的漏报与青龙奇迹，局里各种势力进行了激烈的博弈，都想从这件对上惊动中央、对下有巨大轰动效应的事件中捞取好处，在舆论上占据有利的制高点。

自从青龙县没死一个人的消息传到地震局后，对是否报道此事发生了激烈争论，一派认为唐山地震使地震局处处被动，撤销这个不作为机构的呼声很高，好不容易有个露脸机会，必须大张旗鼓宣传，让领导与群众知道设立地震局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京津组毕竟是地震局的一个下属部门。另一派认为报道青龙奇迹是地震局自掘坟墓，早晚会暴露京津组的正确意见是被地震局官方打压下去的，他们是违背领导意图冒着风险私自把震情捅出去的，为什么不能把京津组的预测意见作为地震局的官方意见向国务院打招呼呢？若上级认真追查下去，地震局则更加被动。两派意见各有各的理，双方从开始获悉青龙县取得明显减灾效果的 8 月份起一直持续到 11 月仍然没有取得共识，简报一次又一次修改但一直没有哪位领导拍板签发。

1976 年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一年，三位主要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四人帮”被粉碎，各派势力纷纷活动，政治形势非常微妙。各部门大幅度的人事调动，许多机构朝不保夕，11 月初撤销地震局的呼声甚嚣尘上。在这种形势下，局领导的当务之急是争取把机构保留下来，所以才决定通报“青龙奇迹”，给已被批评得体无完肤的国家地震局的形象注入了一些正能量，打一剂强心针。

对是否通报“青龙奇迹”问题取得一致后，接着围绕这份简报又开始争论。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局内有些人一直造舆论，想把京津组推出来作为唐山地震漏报的替罪羊以减轻自身压力，“青龙奇迹”公布如同晴天霹雳，罪人瞬间变成功臣，这种 180 度的转弯如何能自圆其说？

地震局的智囊团提出，好在青龙县代表是在地震局召开的 7 月唐山会议上获得信息的，因此召开这次会议本身就为“青龙奇迹”作了贡献，何况在会议上谈及震情的不止汪成民一人。很快，地壳所传出他们才是“青龙奇迹”真正的创造者，王春青实际上是听了他们所某某工程师的意见后采取措施的，汪成民只不过是贪天之功的剽窃者而已，流言迅速扩散，曾经一度被许多人接受。此时，河北省地震局又来凑热闹，他们证明河北省局某某代表也曾把自己的预测意见告诉过王春青，说他才是真正影响青龙作出决策的源头，功劳显赫。

这场闹剧一直到公布王春青等一批与会者的原始会议记录后才平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壳所又传出，虽然话是从汪成民嘴中说出去的，但他仅仅是转达了我们某某的预测意见而已，难道原作者靠边站，而传声筒反而立功受奖？

正在有些人为了“青龙奇迹”立功受奖事喋喋不休地争论时，地震局领导突然宣布收回 17 号简报并予以销毁，表面上说此简报影响安定团结，可能挑起群众不满情绪，会造成河北省政府的被动，实际上是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从张魁三言谈中我悟到：这份简报既能帮助地震局走出困境也能给地震局带来麻烦。在中央领导对地震局工作十分不满时，及时送上这份简报，

证明国家地震局存在的必要性，充分发挥了它对地震局有利的一面；等到国务院决定地震局体制不予撤销、继续保留后，17号简报就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若再让它存在下去，就会暴露出地震局本身的许多问题，需要赶快收回、销毁。

由于我一直在唐山现场负责震情监测工作，很少回北京，当时对上述发生的这一切一无所知，直到通知我交回17号简报时，才了解到围绕17号简报有过如此尖锐的斗争。

6. 京津保卫组被解散

1977年2月，唐山现场工作结束，我回到阔别了半年的北京，明显感到地震局的气氛大变。一把手党组书记胡克实已经正式调离。二把手局长刘英勇居家等待中央重新安排工作，基本不管事。原来雄心勃勃抢班夺权的造反派头头们都惶惶不可终日，蹲在学习班里写检查，地震局工作由从防化兵学院调来的周村军代表主持。

周村把军队作风带进了地震局，雷厉风行、说一不二。很快围绕在他周围又形成一个新的权力中心。他试图把地震局内部对唐山地震不同认识，对没能预报出来的原因的各种争论，粗暴地强行统一起来。他的核心思想是最大限度维护地震局形象。因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试图在唐山地震失误上做文章，通过否定地震局工作来否定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因此对地震局工作要全面肯定，对唐山地震漏报与青龙奇迹的认识必须采取“三坚决”原则。

对唐山地震要坚决否定临震前发现过任何短临前兆、收到过任何预测意见，大力宣传地震预测的艰巨性、复杂性，证明我们虽然已经倾尽全力，但由于客观科学水平所限，要求能预测出像唐山这样复杂的地震是不现实的。

对青龙奇迹必须坚决采取全面否定态度，说明这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没有任何科学意义、推广价值，相反只会造成许多负面影响，如引起社会

动乱、纠缠是非功过、干扰常规科研程序、怂恿人们的投机心理等。

对一切持反对意见者坚决予以封杀，不允许刊发持不同观点的文章，不允许大小会议提供发言的机会，在地震局系统内不允许议论唐山地震可能被预测出来的任何言论，若还不安分、老实，提出异议者则采取组织措施，调离工作岗位。

唐山地震前我是地震局党组任命的保卫京津组组长，地震后是现场指挥部震情分析组组长。根据惯例，从唐山回来应该向地震局党组作一次汇报，但左等右等没有任何动静，我主动找领导询问也碰了一鼻子灰。我在唐山现场写了四五篇文章去投稿，平日追在屁股后面催稿的编辑们突然都变了脸，编造种种理由不愿受理。熟悉的编辑偷偷告诉我：“上面的精神是配合唐山地震的总结，集中发表论述地震预测艰巨性与复杂性的文章，其他观点一概拒绝，你的文章不合局领导精神，尤其还打着京津组的牌子，就更加没有商量余地了！”

为了检验一下京津组是否已被全面封杀，我有意把我组的许多地震预测高手放在一边，特邀请陈非比、徐心同两人合作写了一篇文章投稿。陈非比是为了捕捉唐山地震而牺牲的贾云年的遗孀、河北地震局综合组成员，徐心同是海城地震预测预防成功的有功之臣、辽宁地震局预测专家，我们三人共同写作的文章无论学术水平、影响力都无可挑剔，作为试金石不妨检验一下地震局对贯彻落实中央“唐山地震没能预测出来的原因需要查明”指示的态度，结果文章虽然没被拒收，但迟迟没有刊出。

这时，传来一个更难以理解的消息，地震局准备在石家庄召开唐山地震总结大会，筹备组已经悄悄成立，由坚定认为华北近期无大震的老梅挂帅，核心组成员基本是1976年地震工作重心向西转移的鼓吹者，由这批对唐山地震漏报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专家来执笔写唐山地震总结报告，落实华国锋对唐山地震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以往多年来这种会议都是由分析预报中心京津组（东部组）来参与筹备，地震发生在我们管辖范围内，我作为保卫京津组组长，震前多次提出过正

确意见，提醒领导要重视唐山—滦县震情，震后又一直担任前线震情监测的负责人，竟然连开会通知都没有收到！

我直接闯进周村办公室，要他对京津组没有被邀请参加唐山地震总结大会作出解释。他勉强地接待了我，严肃地说要服从领导安排，石家庄大会的代表名单、筹备组名单都是其他有关同志研究决定的，此事与他无关。

过了几天刘英勇找我谈话，这是他与我最最后一次谈话，也是唯一推心置腹的一次较长的谈话。

“小汪，你知道我很快就会离开地震局的，正在等待中央的安排，我以几十年老党员的身份与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干吗为一些小事去找周村惹他不痛快？”

“对，我去问他参加唐山地震总结大会的代表名额的事。”

“我知道刘西尧、李四光、董铁城、胡克实都很器重你，多少次都想把你提上来，但你的书生气太重，不会审时度势灵活应对，我们没有提拔你是担心你会惹事，例如这一次你犯不上为参加一次会议的小事去得罪周村。”

“刘局长，是我主动拒绝胡克实的，我的性格不适合搞行政管理，家教、家训不希望我从政。在我观念里审时度势与科学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刘英勇看很难说服我，于是避开话题：“那么，集体主义你懂吗？在青龙的事件中，我们心中有数，你救了不少人，国家、老百姓会感谢你的。但是这件事到此为止，你保证以后不要再提了。宣传此事你个人虽然风光了，而国家地震局和唐山市、河北省的地震局都要背上黑锅。共产党员不能把个人的荣誉建立在抹黑集体的形象上，你个人就作点牺牲吧！”

“地震局总共才是个三万人的集体，假如唐山地区都采取了青龙对策我们就可能拯救二三十万人，大力宣传青龙奇迹可能拯救更多人，你说三万人的面子重要还是二三十万人的生命重要？你说的集体仅仅是个小集体，我想的集体要大得多。”

刘英勇用“孺子不可教”的眼光看着我，谈话没法进行下去。临别时

他反复叮嘱我：“你要有思想准备，京津组可能被解散，千万别犯傻，退一步海阔天空！”

几天后周村派人通知我可以参加石家庄的唐山地震总结大会，但条件是发言中不要强调唐山地震前有过前兆信息、发表过预测意见，尤其不准提青龙县根据这些预测意见采取了防震措施，取得了效果，这是一条纪律。

三十年后再广岐告诉我，几乎在刘英勇、周村与我谈话的同时，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也找他谈了话，谈话内容大体一致：

“冉书记，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了不少人，老百姓是会记住你的，但此事到此为止，你用党性保证以后不要再提了，否则对我们的事业、对你本人都不利。”

冉广岐和我三十年来遵守诺言，从来没有主动提及过“青龙奇迹”，若不是1995年联合国派代表团来华调查“青龙奇迹”时国家科委领导指名要我介绍情况，若不是2010年中组部张全景部长受中央委托就“如何在大灾面前做一个优秀共产党员”作调研时，给中央写报告高度评价了“青龙奇迹”，唐山地震时邻县青龙由于事先采取了防震措施而一个人都没死的奇迹依然鲜为人知。

果然，1977年底保卫京津组宣布解散，全体人员重新分配工作，有些人调离预测岗位。这支在中国地震史上屡立战功、英勇善战的部队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它是一支成功的英雄团队，它曾与辽宁省地震局一起取得人类首次对破坏性地震预测预防的成功，为祖国在世界舞台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中国的海城地震预报被世界科学史称为人类战胜地震灾难划时代的“破冰之旅”而永垂青史。

它是一支失败的英雄团队，曾与兄弟单位一些优秀科学家一起几乎取得唐山地震预测成功，在长、中、短、临的地震预测四个高峰上已经顺利攀登了三个高峰，正充满信心攻克第四高峰时，受碍于一些领导与专家的反对，虽然未能挽救唐山全体人民，但仍奋力冲破阻力保护了青龙县47万

人的平安，创造了震惊世界的“青龙奇迹”。

它是一支悲壮的英雄团队，原本是功臣的它却代人受过，遭受来自地震局内外各种骂名，背上漏报唐山地震的沉重十字架而耻辱地离去，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第四部分

二十年潜心磨剑终成器
(1981—2000 年, 46—65 岁)

